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2卷第2期（總第44期）　2025年 12月　頁215~264

【研究論著】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512_22(2).0006

竹內實的中國文學思考與毛澤東觀之情感與理性——以文革為中心

Emotion and Reason in Takeuchi Minoru's Reflec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o Zedong: Focusing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曹嗣衡*
Chi-Hang CHO

關鍵詞：竹內實、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現代中國文學、中日關係
Keywords: 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2024 年 7 月 4 日收稿，2025 年 2 月 4 日修訂完成，2025 年 3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博士。
Ph.D. in Japa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摘要

竹內實（1923-2013）是戰後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主要關注中國現代文學，亦有多種與毛澤東（1893-1976）相關的著作。文革時期，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對中國、文革、毛澤東思想的肯定或否定立場涇渭分明，既有對三者搖旗吶喊、全情投入的「文革禮讚派」，亦有極力否定它們的右派學者。與這些學者不同，竹內實於中國出生、成長，他一方面對中國抱有深厚的鄉土情、熱愛中國文學，又與毛澤東親身見過面，對毛澤東有敬畏之情，但另一方面，他強烈否定文革。他在情感上熱愛中國與毛澤東，在理性上反對文革，顯示了一個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複雜心境。這種複雜心境反映在竹內的學問之上。竹內主要研究與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其學問、論述一方面體現了他對文學的洞見，另一方面流露了他對中國時陰時晴的發展之關心。本文以文革時期前後為討論中心，考察竹內實對中國文學與毛澤東的思考，除了發掘其學問之價值外，亦觀察當中情感的流動，窺探竹內實對現代中國、毛澤東在情感與理性兩方面的角力。竹內的例子展示了戰後日本，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時，如何在純粹肯定或否定的二元選擇外另闢蹊徑，開拓了理解中國的新途徑。

Abstract

Takeuchi Minoru (1923-2013) was a renowned post-war Japanese scholar of Chinese studies, primarily focusing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ducing various works related to Mao Zedong (1893-1976).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apanese scholars of China held distinct positions of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towards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Maoist ideology. There were those who fervently supported the thre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thusiasts," as well as right-wing scholars who vehemently denied their value. In contrast, Takeuch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which fostered a deep attachment to Chinese and literature. He had also met Mao, which instilled in him a sense of reverence. However, he strongly oppos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 complex sentiments of affection towards China and Mao, coupled with his reje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emplified the intricate mindset of a Japanese intellectual towards China. This complexity is reflected in Takeuchi's scholarly pursuits. Primarily studying and transl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 scholarship not only demonstrated his insights into literature but also revealed his concerns about China's fluctuating development. Centering on the period surroun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akeuchi's reflec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 perceptions of Mao. Beyond uncovering the scholarly value of his work, it also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emotional currents, shedding light on the tension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in his engagement with modern China and Mao. The case of Takeuchi illustrates how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en confronted with China, carved out alternative paths beyond the binary choices of simple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thereby opening up new avenues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壹、前言

竹內實（1923-2013）是戰後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其學問關注現代中國文學，並致力於譯介中國文學，亦有多種與毛澤東（1893-1976）相關的著作。竹內出生於中國山東省，戰後在京都大學主修中國文學，後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就讀，往後曾在多間大學及研究所進行教研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曾陷入短暫的經濟蕭條，民間曾出現嚴重飢荒，加上黑市猖獗，社會情況惡劣。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勝出，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之呼聲於此後超過二十年持續高漲，與之一海之隔的日本，知識分子逐漸視中國為社會主義之「先進國」，奉之為日本未來路向的想像。加上日本侵華歷史在前，不少日本人對中國抱有罪惡感，在這種贖罪意識的驅動下，且隨著全球左翼革命陸續展開，此想像一直持續，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更達至高峰，成為日本全國左翼運動的推動力之一，及後更演變成激進的新左翼革命，帶來血腥的暴力事件。竹內與同時代的學者相同，其學術無可避免地受這股左翼思潮影響。

以文革時期為例，日本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立場相當分明：有旗幟鮮明、極端狂熱地支持毛澤東思想、文革的「文革禮讚派」，[1]亦有如中嶋嶺雄（1936-2013）般由始至終極力批判毛澤東思想的學者。[2]與這些立場清晰，可被籠統歸類為「左派」或「右派」的知識分子不同，竹內出生及成長於中國，對中國有深厚感情，也同情革命，但他強烈否定文革，與當時日本多數「左派」中國研究學者的態度相反。他曾親身見過毛澤東，相當敬佩毛澤東、對中國與中國人既有同情，也有鄉土情，說得上兼具

[1] 如新島淳良（1928-2002），他在一九七○年以前，無條件地支持毛澤東思想及文革，甚至認為其思想與中國傳統斷絕，是一種無比優秀的思想。見曹嗣衡：〈新島淳良對毛澤東的思想詮釋：「矛盾」非《周易》的「陰陽」〉，《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59 期（2023 年 5 月），頁 87-120。

[2] 關於中嶋嶺雄的經歷、中國研究概況與心境，參馬場公彥：《戰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興まで》（東京：新曜社，2010 年），頁 595-608。Baba Kimihiko, *Postwar Japanese Image of China: From Japan's Defeat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and China* (Tokyo: Shinyōsha, 2010), pp. 595-608.

「溫情與敬意」，這又使他與中嶋嶺雄辛辣地否定文革的姿態完全不同。他曾如此形容自己：「我個人在中國出生，我想念中國，對新中國的發展感到喜悅，因此我開始了研究（雖然是不可稱為研究的研究）。我不是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對中國產生興趣，但我曾經認同及憧憬過社會主義。我對文革沒有共鳴。從對文革共鳴的人來看，我是『非友好分子』吧，就像敵人一樣。」[3]

歷來學者對竹內的關注主要在他與毛澤東相關的著作上，對之頗有嘉許，例如：一，他曾撰寫《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從文學角度賞析毛澤東的詩詞，藉此了解毛澤東在不同時期的心境，開創從文學角度剖析毛澤東形象的先聲；二，他曾三度為毛澤東作傳，其中兩傳在文革時期出版，為日本人提供了一條認識毛澤東的路徑；三，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他曾主持編輯並出版《毛澤東集》，收集了毛澤東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之間的文章，其中一些部分，連周恩來（1898-1976）也看過。[4]中國大陸對竹內實的毛澤東研究評價不俗，除了因為他公正地評價毛澤東外，還有他能從文學的角度勾勒了毛澤東浪漫的軟性形象，加上竹內在資料收集、考證鉅細無遺，他對毛澤東研究作出的重要貢獻是毋庸置疑的。[5]

然而，在學術研究以外，竹內作為一個在理性上與情感上深受中國影響的知識分子，其形象與心理卻未受到足夠關注。在中共建國初期，竹內為此感到喜悅、對中國未來抱有極大希望；後來接踵而來的各類整風、批判運動，甚至到了中國核試，竹內愈來愈感到不安，但仍然「理解」中

[3]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文化大革命》（東京：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2009 年），頁 278。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kyo: Asia-Eurasia Research Institute, J.F. Oberlin University, 2009) , p. 278.

[4] 菅沼正久：〈60 年代、中国研究の奇禍——新島淳良と竹内実のこと——〉，《中国研究月報》，第 56 卷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38。Suganuma Masahisa, "The Strange Dis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1960s: Niijima Atsuyoshi and Takeuchi Minoru,"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56, No. 12 (Dec., 2002), p. 38.

[5] 對竹內的毛澤東研究之評價，參紀穎穎：〈竹內實毛澤東研究的貢獻、價值及啓示〉，《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第 27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82-92；曹景文：〈竹內實和他的毛澤東研究〉，《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40-44。

國，疑中留情；到了文革，竹內不忍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被批鬥至死、喪失尊嚴，終於直接批評文革與毛澤東。竹內對中國的態度，一直在情感與理性之間波動及拉扯。

本文考察竹內對中國文學的思考與其毛澤東觀，探討其情感與理性的互動。本文探討竹內關注的「中國文學」有兩個所指。首先是中共建國後的中國文學，當中既有主流作家的小說，也有近乎政治宣傳的平民民文學如「公社文學」，竹內視毛澤東為詩人，自然也包括毛澤東的詩詞。其次，是指竹內的文學翻譯工作。文革是最激發竹內對中國的矛盾情感之歷史事件，他所關注的文學則成為他情感、理性角力的軸心：他從文學窺探到中國的新社會、新希望，於是既譯介文學，也對知識分子有深切關懷；他對毛澤東抱有感情，加上毛澤東又賦詩詞，令他更加渴望理解毛澤東的心境；然而文革對文化活動的破壞、對知識分子的逼害，又令他回復冷靜，理性地評價毛澤東。

從情感與理性來理解竹內具有兩種意義：第一，它反映了文革在海外傳播並對知識分子的影響，並不止簡單地在對他們的理論、行動，而當中涉及更複雜、私人的情感；第二，它顯示了日本戰後至文革時期，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時，如何在純粹肯定或否定的二元選擇外另闢蹊徑，開拓了理解中國的新途徑。

貳、文革前竹內實的中國觀：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思考

竹內譯介的文字種類相當廣，既有小說、散文、傳記，亦有政治文本，其選取的作品，本身就反映出他對中共建國後新社會的盼望。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人民兵工的驕傲」、「受群眾尊敬的工人作家」，被譽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4〕的主角）」的吳運鐸（1917-1991）出版了自傳小說《把一切獻給黨》，往後改編為話劇，於全國各地上演。據稱它「先後發行了一千多萬冊，被譯為俄、英、德、日等多種外國版本，在青年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以吳運鐸為榜樣，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

業，獻身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事業，成為億萬青年的共同心聲和自覺行動」。[6]

竹內實於一九五五年末完成《把一切獻給黨》的日語翻譯，並對此書讚譽有嘉。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相比，他認為《把一切獻給黨》「雖然有著更樸素、更自傳式的不同，但正因如此，它才有一種力量，讓人認識到這種親身建立新中國的新型英雄就在我們身邊」。吳運鐸出身貧窮，於兵工廠工作時因意外傷殘，但仍為國奉獻，竹內為之感動，認為當「我們知道他走過的道路是中國的勞動者階級走過的道路，透過這道路，獲得了今日的和平國家、民族獨立的國家，即新中國誕生時，就得到很大感動和勇氣」。竹內又認為，如果日本人同樣想為建立和平、獨立的日本而盡一點綿力，這本書就像是「給予作為中國的兄弟的我們溫暖激勵的信」。[7]他亦曾與伊藤克（1915-1986）翻譯吳源植（1933-）的《金色的群山》（1960），那是部描繪雲南少數民族佤族從被壓逼到解放的長篇小說。譯本的譯後語，也能窺探到竹內對中共建國後於國內民族平等的功勞之肯定。[8] 他的著眼點在「和平」、「（民族）獨立」、「民族平等」等，與「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事業」或「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直接關係不深。

竹內曾兩度翻譯《毛澤東語錄》。[9]讀此「紅寶書」時，他最受感動的，是毛澤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的一節。[10]竹內鍾情於長期

[6] 趙長安、王吉文：《中國的保爾：吳運鐸的故事》（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2005年），序言頁3、前言頁2、頁113-114。

[7] 吳運鐸：《すべてを黨に》，竹內實（譯）（東京：青木書店，1955 年），頁 233-234。Wu Yunduo, *Give All to the Party,* trans. Takeuchi Minoru (Tokyo: Aoki Shoten, 1955), pp. 233-234.

[8] 吳源植：《金色の山々》，竹內實、伊藤克（譯）（東京：至誠堂，1962），頁 377-379。Wu Yuanzhi, *Golden Mountains*, trans. Takeuchi Minoru & Itō Katsu (Tokyo: Shiseidō, 1962), pp. 377-379.

[9] 曹嗣衡：〈《毛澤東語錄》的民間日語翻譯及其意識形態〉，《編譯論叢》，第 17 卷第 1 期（2024 年 3 月），頁 53-59。

[10] 竹內實：〈あとがき〉，收入毛澤東：《毛沢東語録》，竹內實（譯）（東京：角川書店，1971 年），頁 395-396。Takeuchi Minoru, “Afterword,” in Mao Zedong, Quotations

默默做好的小事、平凡事之輩。是故他對為國效力、受傷也毫無怨言的吳運鐸的讚美之詞溢於言表，言從中獲得「感動和勇氣」未必是誇飾之詞。此年正值中共建國後第七年，是他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毛澤東的施政抱持肯定認同的時期，這亦是他翻譯此書的推動力。

竹內關心平民百姓的生活，他既親身考察了人民公社，也逐漸關注所謂「公社文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他到了河北省徐水縣的謝坊村，之後到了鄭州、成都、麻城、番禺等地的人民公社，親身了解那些刻苦、勤奮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他在謝坊村看到中國人民個個刻苦工作、道路潔淨，在農田工作的女性們唱起歌來，令他感到一股「新鮮的感動」，也看到了人們為大眾工作而感到快活的生活方式。竹內在這裡看到中國人為大眾無私付出，受了很大的感動，更改變了一些想法：以前我們總認為「人」是住在自己的家、享受自己的生活，但這裡卻看到了人們為大眾公作而感到快活的生活方式。[11]事實上，竹內沒有在這裡過夜，也沒有到農田看人工作，但他看到中國《文藝報》的某篇文章，講述徐水縣的人們在「解放後」為公奉獻，爭相獻出糧食、資金，情緒高漲，他就認為這文章補足了自己的親歷，更加認為「這裡噴發出大眾爆發式的能量。使這種能量能夠爆發的，當然是毛澤東或以他為中心的組織者。這樣的能量甚或超乎了毛澤東等人的想像」。[12]竹內在這趟旅程親眼目擊中共建國的成就、人民公社的效率、中國平民無私勤奮的樣子，他感到相當興奮：「即使我所說的會被斥為讚美論，但創造人民公社的人，他們作為人的存在觸動了我的心底，我無法不在他們身上感到那無比的魅力，即使是現在我還感得到那份魅力。」[13]

---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trans. Takeuchi Minoru (Tokyo: Kadokawa Shoten, 1971), pp. 395-396.

[11]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新日本文学》，第 14 卷第 3 期（1959 年 3 月），頁 91-92。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4, No. 3 (Mar., 1959), pp.91-92.

[12]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93-94。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p. 93-94.

[13]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98。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98.

人民公社的壯觀與成功的現實，卻讓身為文學研究者的竹內感到不安，令他思考政治與文學之間的衝突。毫無疑問，人民公社使不少貧民的生活改善了，帶來「解放」。可是，竹內預期「人民公社的成立使貨幣或家庭的功能改變，即人們對這些事情的思考方式的改變，對今後的中國文學會帶來重大影響」。[14]從公社的成立思考文學的改變，緣於他在《文藝報》看到一則名為〈奶牛入社了〉的故事。其梗概如下：一名貧農為了社會主義建設，打算將自家養了兩年半的乳牛帶到合作社。他的妻子捨不得，貧農解釋這牛是因為共產黨和毛澤東才有的，便說服了妻子，把乳牛帶到合作社。但是，一名富裕中農不願把自己的兩隻乳牛送到合作社，眾人就貼大字報批判他。富農抵不住壓力，終於把牛送到合作社，但在當晚又把牛帶回家，眾貧農與他爭拗了數日。貧農的妻子感到不耐煩，抱怨：「自己牛入了社，就好了，何必還要拉別人，裝黑臉，和人家結冤結仇！」貧農理直氣壯地道：「你這話不對，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為著大家好，這又不是做壞人，更不是專為吃飽飯跟人家結冤結仇。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啊！」最後所有乳牛都入了公社，奶產量大增。[15]從文學的角度看，故事中的牛具觸發衝突的功能；從現實上看，牛作為一種財產與生產工具，牠是民眾間階級鬥爭的矛盾，也是真實生活的反映。竹內從中獲得啟發：

> 文學和文學家在某種意義上，都應該位處於人民公社的乳牛或豬的同列之中。甚至，他們應該能夠在那些乳牛或豬的相同位置上做文學，擔起表達這疾風怒濤時代的責任。[16]

竹內的意思，並不是說文學應該反映社會最下層生活，而是文學與文學家有責任揭露人與人生活間的衝突與矛盾，因為矛盾的鬥爭是不斷的，

[14]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95。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95.

[15] 鄭羽官口述，許謂藩、李鄉瀏記：〈奶牛入社了〉，《文藝報》，第 23 期（1958 年 12 月），頁 13-14。

[16]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99。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95.

它有助社會進步。竹內從中國各地的人民公社看到了連續不斷的革命，所謂「革命是現在進行中」的過程，那並非「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勝利並完結的東西」，對中國的革命領袖而言，「革命不是僅有一次，而是連續不斷的之事。革命是只要仍活著就應該不斷繼續的事業，中國革命的勝利並不意味著革命完結，而是意味著新的革命的開始」。[17] 那是來自毛澤東〈矛盾論〉的理論。[18]竹內認為文學所揭露矛盾、衝突不是為了抵抗政治，反之，那是為了讓中國社會更能順利地運作、進步、革命下去：「我不認為政治與文學的矛盾會消失。沒有矛盾，運動也會消失。恐怕今天兩方面應該也還沒有到那死滅的狀態。」[19]

竹內窺探到文學中乳牛的象徵意義，發展成迎合毛澤東關於矛盾的想法，其文學觸覺相當犀利。可是，他又從中感受到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悖論：當矛盾與衝突發生時（如：私有財產〔乳牛〕的問題），其激起的思想鬥爭、階級鬥爭又將之撲殺（如：貼大字報）——即「運動」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消滅「矛盾」，那麼新的矛盾——推動社會進步的矛盾，還能夠產生嗎？他從民眾之間的激烈批判感到不安：

> 我認為除非文學能完全吸收這個過度政治化的空間，並成為政治本身，否則我們無法期待看到新文學的出現。今日的政治＝文學已經向前邁進到那個地步。透過設定名為政治與文學的兩個不同地點來透視〔問題〕，這種政治觀、文學觀已經無效。[20]

雖然竹內對中國的人民公社感到無限感動，但目睹文學逐漸被政治破

[17]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98。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98.

[18] 毛澤東認為對「矛盾」的研究，是「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見毛澤東：〈矛盾論〉，收入張迪杰編：《毛澤東全集（卷 11）》（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年），頁 54-55。

[19]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100。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100.

[20] 竹內實：〈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頁 100。Takeuchi Minoru,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p. 100.

壞時，他的內心蒙上陰霾。他坦言不認同政治與文學完全結合，原因不在於文學理應是一種自由的藝術，而是在於文學有表達人們真實生活的矛盾、衝突的功能，他相信這種功能將有效推動社會、延續革命，反之，沒有文學，社會就會失去革命，走入死胡同。這次中國之旅為竹內的內心播下了矛盾的種子：一方面為中國的成就感到振奮，另一方面又從文學察覺到中國社會所醞釀著的不安元素。在一喜一憂兩種力量的拉扯下，此時期的他似乎仍傾向前者。他的憂慮蘊含著某種認為文學還是有超越政治的可能之樂觀。他從來沒有預計到這種樂觀將會在數年後被完全消滅，因為此時的他仍然無法領悟到「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角力中，最終失敗必然是文學」，在現代中國歷史的洪流上，「筆權從來沒有能夠戰勝政權」。[21]

因文學之名，竹內能以此為媒介，將中日兩國的政治環境連繫思考。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以小說家野間宏（1915-1991）為首的「日本文學代表團」出發到中國訪問五星期，竹內、大江健三郎（1935-2023）等人亦是成員之一。當時正值日本安保鬥爭的高峰。六月十五日是鬥爭的最高潮，全國約有五百八十萬人參與罷工、示威。[22]警察機動隊在國會議事堂正門前與示威者發生嚴重衝突，示威者之一、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1937-1960）死亡。當時仍身在北京的代表團得知消息後悲痛不已，向人民英雄記念碑獻花圈，由野間讀出弔辭，亦有僧侶讀經，隔海哀悼樺美智子。樺為民主抗爭而死，想必目睹了新生活下的中國人的竹內會為此慨嘆中國已經踏上理想社會之路，但日本仍然沒有，因而他「確信這裡的人都懷著一顆灼熱的、堅繫著東京與北京的心」。[23] 在這種氣氛下，代表團雖以「文學代表團」為名，本應與中國就文學交流心得，最後幾乎所有日程都集中

[21] 王宏志：〈筆權和政權〉，收入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萬芷均、陳琦、裴凡慧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xxiii-xxiv。

[22] 許仁碩：《公安警察と治安判決（1980-2010）：先制的デモ規制体制の確立》（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論文，2020 年），頁 25。Hsu Jenshuo, “Public Security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Judgments (1980-2010): Establishing a Preemptive Regime for Controlling Demonst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Hokkaido University, 2020), p. 25.

[23] 竹内實：〈新しいものと古いもの〉，收入野間宏等：《写真•中国の顔：文学者の見た新しい国》（東京：社会思想研究会出版部，1960 年），頁 116。Takeuchi Minoru, “The new and the old,” in Noma Hiroshi et al. (eds.), *Photographs, the Faces of China: Literary Scholars' View of the New Country* (Tokyo: Shakai Shisō Kenkyūkai Shuppanbu, 1960), p. 116.

在討論反對安保條約上。[24]

六月二十一日，文學代表團在上海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竹內似乎沒有直接跟毛澤東交流，儘管帶著「文學代表」的身分，但竹內未能把握機會，向毛澤東表達自己對中國文學的擔憂。不過他亦非一無所獲：至少親眼見過「毛主席」，握手時，他的手被毛澤東的手「柔軟地、溫暖地」包著，他對毛澤東的景仰拾級而上。看來，相較於得到安保鬥爭的支持、建議、文學交流，以及到中國各地遊覽，見到毛澤東本人比一切都要珍貴。竹內難忍其感動與震撼，肉麻地形容毛澤東是個「期待年輕世代、成熟的、偉大的人」。[25]

在中、日文學的比較之中，竹內也會從中國文學思考日本文學，試圖從中國文學中汲取價值，與日本文學產生對話。一九四一年，丁玲（1904-1986）發表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小說裡「我」到霞村休養，認識一名少女貞貞，她曾被日軍擄走作慰安婦，但同時又利用這身分進行地下活動、學會了一點日語，能收集情報，抗日救國。她得病返回霞村養病，但守舊的老一輩卻認為貞貞不潔。她在鄉裡有一個喜歡的男生，但現在亦不能與他一起。她雖然對「我」傾訴，但最後亦離開了霞村，到其他地方（應該是延安）治病。[26]學者王德威認為小說雖然文筆粗糙，卻「意外地透露了她〔丁玲〕對婦女問題的深切體驗」，並「揭發了革命的階級鬥爭或前進的意識形態，依然有男女之別，而女性的遭遇亦無法化約為『人民』或『國家』的境況」。[27]竹內較王德威樂觀許多，他從小說看出的不是

[24] 竹內實：〈毛主席に聞く『安保闘争』の評価〉，《朝日ジャーナル》，第 2 巻第 30 期（1960 年 7 月），頁 75。Takeuchi Minoru, “Chairman Mao’s assessment of the ‘Security Treaty Struggle,’” *Asahi Journal*, Vol. 2, No. 30 (Jul., 1960), p. 75.

[25] 竹內實：《毛沢東ノート》（東京：新泉社，1971 年），頁 50、71。Takeuchi Minoru, *Notes on Mao Zedong* (Tokyo: Shinsensha, 1971), pp. 50, 71.日本文學研究者龜井勝一郎（1907-1966）亦是代表團成員，他亦寫有寫過這次會面的詳細經過。見龜井勝一郎：《中国の旅》（東京：講談社，1962 年），頁 117-131。Kamei Katsuichirō, *The Trip in China* (Tokyo: Kōdansha, 1962), pp. 117-131.

[26]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收入丁玲著，陳明編：《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延安作品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212-229。

[27] 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77。

女性在革命的困境，而是發現戰爭文學中人文主義的希望，那是比日本進步的文學觀。

竹內力圖證明中國文學中的人文主義較日本文學的進步。他以日本作家富士正晴（1913-1987）的小說〈過夜〉（一夜の宿，1957）與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作對照討論。〈過夜〉以第一人稱、在中國行軍的初級日軍士兵「我」為視角，講述「我」的軍旅生活與所見所聞，沿途穿插了一般平民的生活片段。自命清高的「我」時常有哲學式思考，對戰爭不感興趣，也看不起粗暴、寫錯字的同僚，亦堅持在戰爭中不強姦女性。在一個下雨的夜晚，一名年輕的中國女子突然出現，「我」和她相處了一晚，甚至發生了親密關係。[28]〈我在霞村的時候〉的貞貞絕口不提她在日軍的遭遇，小說對此亦沒有作任何描述；〈過夜〉則極盡細緻地描述身為日軍的「我」如何與女子的相處。竹內認為〈過夜〉正正填補了〈我在霞村的時候〉缺少的部分。[29] 他認為兩篇小說具有共通點，如在人物的人性塑造上，貞貞與〈過夜〉的女主角是一體兩面：前者頗理解作為敵人的日本人，知道他們收藏著女人寫的信，為了方便行事，自己亦懂得一些日語；後者一時對「我」表現出反感，一時似乎又在討好「我」。竹內指出，兩個女主角都是作為「感受到與人的親近度有關的人物」而登場，但所指的不僅是與兩個「我」的親近，更是「與人的疏遠度，也即對自己人的憎惡」。他解釋，貞貞回到霞村時，受到村的長者、婦人鄙視，認為她已受日本人糟蹋，是個不潔之人；而〈過夜〉的「我」被老兵要求把女子「借來」的時候，「我」不但拒絕，更感受到一種「戰慄」。〈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我」對這群歧視貞貞的人也同樣懷有厭惡；〈過夜〉的「我」則對老兵感到不安與怨憤。兩篇小說都有對「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憎惡。在守舊的世代與進步的新世代之間劃上一條清晰界線的，就是這種帶有對自

[28] 〈過夜〉收錄在富士正晴：《游魂》（東京：出版書肆パトリア，1957 年），頁 133-218。Fuji Masaharu, *Wandering Soul* (Tokyo: Shuppan Shoshi Patoria, 1957), pp. 133-218.

[29] 竹內實：〈戰争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新日本文学》，第 16 卷第 11 期（1961 年 11 月），頁 132。Takeuchi Minoru, “W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6, No. 11 (Nov., 1961), p. 132.

己人憎惡這黑暗面的人文主義。[30]或許可說，竹內在小說內發現張灝所謂「幽暗意識」，[31]他在「幽暗意識」當中找到其光輝的一面。

從乳牛引發的矛盾、對「自己人」的憎惡，可看出竹內對中共建國後的文學有共通的關心，以他的說法，就是「不能把敵人當作敵人的精神，只不過是不把盟友當作盟友的精神的另一個面向」，[32]亦就是文學能夠且應該將新的、進步的事物與舊的、退步的事物對比呈現出來，能夠展示矛盾，也代表了能夠解決矛盾，從而達至進步。從人文主義的角度比較，竹內認為中國文學比日本文學優秀，至少〈我在霞村的時候〉比〈過夜〉更具人文主義。因為日本畢竟是侵略國、加害者，故事中的「我」雖然反抗老兵，但「從軍隊批判、戰爭批判的角度來看，〈過夜〉的『我』的人文主義薄弱且不徹底」，甚至留戀那名中國女性，所以〈過夜〉充其量是「半人文主義（semi-humanism）」，不及〈我在霞村的時候〉的強。

竹內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思考，理想化了文學所描繪的社會圖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政治意涵。例如，他強調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展露的人文主義，指出那是中國文學的光芒，含糊帶過了丁玲被批判的事實，[33]得出「半人文主義的生命仍然在日本的戰爭文學裡面紮根存活」的結論。[34]在文

[30] 竹內實：〈戰爭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頁 132-134。Takeuchi Minoru, “W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pp. 132-134.

[31] 張灝為「幽暗意識」定義：「所謂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頁 24。

[32] 竹內實：〈戰爭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頁 134。Takeuchi Minoru, “W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p. 134.

[33] 竹內另有兩篇文章關於丁玲的文章。一篇指出批判丁玲一事中，「產生了政治色彩較強、幾乎沒有文學批判的傾向」，並為她辯護，認為文學必然有作家的個人風格，批判丁玲將成為摸索「社會主義下文學的理想狀態」的「測試個案」。另一篇則簡單介紹了中國對丁玲其人其作品評價的變化，不置評語。竹內實：〈丁玲批判の一結末〉，《アジア経済旬報》，第 344 期（1957 年 12 月）頁 4-9. Takeuchi Minoru, “One conclusion of criticism of Ding Ling,” *Ajia Keizai Junpō*, No. 344 (Dec., 1957), pp. 4-9.；竹內實：〈丁玲評価の変遷〉，《文學界》，第 13 卷第 8 期（1959 年 7 月），頁 174-176。Takeuchi Minoru, “Changes in Ding Ling’s reputation,” *Bungakukai,* Vol. 13, No. 8 (Jul., 1959), pp. 174-176.

[34] 竹內實：〈戰爭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頁 135-137。Takeuchi Minoru, “W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pp. 135-137.

學與政治的角力之間，他仍然對文學抱有期望。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政治已經開始深入地影響文學，這點竹內非常清楚，但是他現實的態度與其宣稱的理想頗有出入。他不斷為中國文學打氣，卻極少譴責文學與文學家受到批判與打壓的政治現實。[35]這無動於衷的態度，是他一方面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充滿希望，一方面對文學發展感到焦慮的矛盾體現。

逐漸將竹內在文學內的政治理想帶回現實的，毫無疑問，正是意識形態日趨尖銳的中國政治現實。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首次成功引爆原子彈，震驚全球。中國的核試驗為日本知識界帶來衝擊，尤其是中共的支持者，一時不知所措。[36]學者形容「中國的核試驗，〔令日本人〕對一直以來被視為和平革新勢力且曾公言不擁核的中國的清新形象產生懷疑，甚至成為動搖社會主義理念與信賴的契機」。[37]竹內就是受到震撼的其中一人，他直斥有支持中國核試驗的日本知識分子就連非核試驗、非核武裝的聲音都要抹殺掉：

> 將社會主義、中國、中國人民、非核試驗、非核武裝〔……〕歸類為善的系列，將這些事物逐一整齊地納入於這系列裡，是昨日的思考方法的特色。接著可以再將社會主義陣營、和平勢力、蘇聯、蘇聯與中國的團結、蘇聯對中國的無私援助〔……〕等題目都往這系列補充。〔……〕在這幾年間，是誰將有礙於這善的系列的概念或題目逐一抹殺的，

[35] 蕭軍（1907-1988）曾在小說《五月的礦山》（1954）批判官僚主義，因而受到批判，指責他實際是反對中共的領導。竹內曾為蕭軍辯護，並批評那些批判蕭軍的人不過是機械地認為文學應該從屬政治。但竹內也就僅此評價而已。竹內實：〈魯迅とその弟子たち〉，《新日本文学》，第 11 卷第 10 期（1956 年 10 月），頁 131。Takeuchi Minoru, "Lu Xun and his disciple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1, No. 10 (Oct., 1956), pp. 129-131.

[36] 例如「文學代表團」長野間宏曾說：「在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民族獨立的要求更加堅決了，反對原子武器和氫武器的運動具有更大的規模，尤其是因為麥克阿瑟可能在朝鮮使用這種武器。」他以此為由，支持中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見野間宏：〈國際緊張局勢對作家的活動所起的影響──在塔什干亞非作家會議上的發言摘要〉，《文藝報》，第 21 期（1958 年 11 月），頁 39。

[37] 馬場公彥：《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頁 226。Baba Kimihiko, *Postwar Japanese Image of China*, p. 226.

> 我就不說了。現在〔他們〕就連非核試驗、非核武裝都要抹殺。[38]

親中共的人本以其聲稱的和平為一大支持理由，當中包括其公言不擁核。然而，當中國進行核試驗後，這群人一部分為了支持中國，退而求其次，又將反對核試驗退縮為反對核戰爭——因為，反對擁核、反對核武裝作為「昨日」支持中國的理由，在「今日」已經變成否定中國的理由。竹內認為這邏輯的產生，毫無疑問是中國造成，他為此感到相當失望。[39]讓竹內更擔憂的是，日本人這種思考方式的退讓，難保有一天不會演變成支持中國發動核戰。他堅決地表示能理解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客觀條件」，但自己則無法支持，重申「理解與支持是兩回事」。[40]竹內實在無法認同一直打著和平旗號的中國進行核試驗，但是，他還是相當「理解」中國，可算是疑中留情。

竹內的內心相當複雜。因為懷著「昨天」的思考方法的，很大可能也包括他自己。他固然熱愛中國，在很多方面上覺得日本應該好好向中國學習，這也是當時視中國為社會主義先進國的日本親中左派的共通想法。與論壇上的「文革禮讚派」不同，竹內能認清「理解」與「支持」之別，這是他與那些真正的狂熱分子之間的清晰界線。他對中國有真切的感情，但他亦有底線。無論如何，中國進行核試驗，已經動搖了竹內對中國前途的信心。問題是，如果連進行核試驗，都還沒有使他對中國失去希望，究竟其底線何在？終於，在核試驗不到兩年，文革來臨，竹內終於向毛澤東思想訣別。

---

[38] 竹內實：〈中国核実験と日本知識人〉，《新日本文学》，第 20 巻 1 期（1965 年 1 月），頁 125、129。Takeuchi Minoru, “China’s nuclear tests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0, No. 1 (Jan., 1965), pp. 125, 129.

[39] 竹內實：〈中国核実験と日本知識人〉，頁 131。Takeuchi Minoru, “China’s nuclear tests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p. 131.

[40] 竹內實：〈中国核実験と日本知識人〉，頁 132、134。Takeuchi Minoru, “China’s nuclear tests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pp. 132, 134.關於日本民眾對中國核試的反應，見 Erik Esselstrom, *That Distant Country Next Door: Popular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Mao’s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pp. 54-91.

參、文革之後竹內實的中國觀：文革批判及其對知識分子處境的反思

觸動竹內情感的，始終是文藝界、知識分子的遭遇。臨近文革，中國國內批判修正主義的形勢升溫。竹內特別關心知識分子被批判的情況。例如，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學習毛主席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體會〉文章，[41]使哲學家楊獻珍（1896-1992）受到批判。竹內一向很少探討哲學思想，這次他卻花了不少篇幅解釋，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之所以被批判，是因為它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這樣的系譜」。[42]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不是竹內的關心所在，他特意提起楊獻珍被批判之事，並不尋常。即使他相信中國各界發生的廣泛批判事件並非「個別地誰批判誰」，而是背後很大可能「有黨中央的指導」，但他無意為那些被批判的人伸冤或反批評「黨中央」，反而推測曾在俄國、德國留學的楊獻珍敢於提出「合二而一」說，可能是為了避免鬥爭的哲學全面滲透到中國社會，於是引入這種外國思想，與之抵抗。他在當中看到這名用心良苦的「知識分子拼命的努力，被所謂的社會性暴力蹂躪了」，感到相當難過與可惜，甚至是「寂寞」。他對知識分子被批判感到同情，但對此種批判知識分子風潮的思想模式，只有一句「不好」的評語。[43]他對背後的「黨中央」，還留有相當大的情面。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文學家、史學家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1892-1978）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自我批判：「幾十年

[41] 艾恒武、林青山：〈「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學習毛主席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體會〉，《光明日報》，1964 年 5 月 29 日，第 4 版。文章作者受楊獻珍的鼓勵與啟發而寫下這篇文章。

[42] 竹内實：〈なにが中国で起こっているのか──中国文化界の最近の動向をめぐって〉，《新日本文学》，第 20 巻第 5 期（1965 年 5 月），頁 87。Takeuchi Minoru,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Recent trend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0, No. 5 (May, 1965), p. 87.

[43] 竹内實：〈なにが中国で起こっているのか〉，頁 84、89-90。Takeuchi Minoru,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Recent trend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s,” pp. 84, 89-90

來，一直拿筆桿子在寫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44]郭沫若寫過歷史劇《武則天》（1962），這是一部將武則天（624-705）描繪成聖帝明君的歷史翻案劇。[45]竹內起初並不知道，郭沫若在劇中將武則天與唐中宗李顯（656-710）並舉為「二聖」，被質疑是吹捧劉少奇（1898-1969），因此要慌張地與此撇清關係。[46]竹內對於郭沫若為甚麼要寫《武則天》也沒有頭緒，它與當時一片讚美社會主義建設呼聲的背景，似乎沒有甚麼關係，更何況這劇頌讚的人物是一名皇帝。[47]竹內在文革開始時，沒有預料到它會發展成後來規模如此龐大、激進的運動，只覺得郭沫若那「全部把它〔自己的著作〕燒掉」的發言只是誇張、一種「詩人的說法」：

> 郭沫若「全部把它燒掉」的說法，肯定只是他身為詩人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在這兩三年急速傳開。如果文學、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鴻溝只能靠郭氏的這句話來越過，那麼雖然那是壯舉，但同時也是郭氏的悲劇。[48]

他所謂「悲劇」，是萬一郭沫若真的要將自己的著作燒毀掉，就等於拋卻了文人的崢嶸風骨。他認為郭沫若的發言只是一種「詩人的說法」，恐怕是期待郭沫若只是信口開河，並非真心要把自己的著作燒掉。竹內當時並不認為（或未意識到）郭沫若自覺將會大難臨頭，傾向相信他的發言只為了越過「文學、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鴻溝」。這顯示竹內低估了中國政

44 〈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光明日報》，1966 年 4 月 28 日，第 1 版。

45 郭沫若：《武則天：四幕史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 年）。

46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9-10。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9-10.

47 竹內實：〈郭沫若の歴史劇について〉，《新日本文学》，第 21 卷第 7 期（1966 年 7 月），頁 140-142。Takeuchi Minoru, "About Guo Moruo's historical drama,"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1, No. 7 (Jul., 1966), pp. 140-142.

48 竹內實：〈郭沫若の歴史劇について〉，頁 144。Takeuchi Minoru, "About Guo Moruo's historical drama," p. 144.

治環境與文學之間一直存在的壓倒性之不平等，他對中國的文學家寄予了頗多同情，但這同情又衍生了某些理想化的幻想，譬如文學家不會出賣文學，等等。

竹內幾乎不參與當時對中國政治的論爭。他自言不習慣這種議論，也沒有相關社會科學理論的背景知識。[49]這並非自謙之詞。對郭沫若自我批判事件起初的分析，反映了此時竹內對中國政治形勢的理解仍然幼稚。這是當時日本不少中國研究者具有的盲點，即因日本侵華戰爭而對中國抱有贖罪感，從而傾向同情中國一切現實。竹內也擔心郭沫若這激進的說法會成為「知識分子骨牌效應的契機」，可是，他又說：「從這個意義上說，並不能斷言那種全盤否定的說法只會對中國的文化界產生正面影響。」[50]我們應當問的是，一個文人宣稱要把自己的所有著作燒毀，究竟可以帶來甚麼「正面影響」？

竹內嘗試將郭沫若的自我批判以及知識分子被接連批判的浪潮置於文革的脈絡來分析，先指出文革的內涵，並同時指出這運動的一些荒誕之處與危險性。他還是不認為郭沫若是真心要將自己的著作燒毀：

> 雖然沒有信心可以斷定他〔的發言〕毫無反話或諷刺，但我認為，說他是謙遜，是在宣言要寫出更好的作品，才是符合他的理解。這是自我批判，但也是對其他學者或文學家的呼籲。[51]

竹內認為郭沫若向「其他學者或文學家」「呼籲」的，是如標題「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所揭示的，郭在發言最後提到「我們應該向工農兵感謝，拜工農兵為老師，因為他們把〔毛〕主席思想學好

[49] 馬場公彥：《戰後日本人の中国像》，頁 500。Baba Kimihiko, *Postwar Japanese Image of China*, p. 500.

[50] 竹內實：〈郭沫若の歷史劇について〉，頁 144。Takeuchi Minoru, “About Guo Moruo’s historical drama,” p. 144.

[51] 竹內實：《中国──同時代の知識人》（東京：合同出版，1967 年），頁 38。Takeuchi Minoru, *Chin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Tokyo: Gōdō Shuppan, 1967), p. 38.

了，用活了」，因此他「現在應該向工農兵好好地學習」。[52]竹內在文革最早期時，認為它體現的「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除了「一分為二」這點外，就是「活學活用」。[53]即文人學習毛澤東思想是這場運動的重點，甚至可以稱之為「民眾級別」的「毛思想學習運動」。[54]他認為批判文人與文革有緊密關係，使得這場運動冠以「文化」之名：

> 批判著名文化人與文化革命是表裡一體的，它帶有可稱之為整風運動的性格，只是中國仍未使用這樣的名稱。現在稱它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解放軍報》社論，四月十八日）。這個問題似乎無關重要，但中國共產黨發起這樣的社會運動時，不太可能會曖昧不清或改變〔運動的〕性格，從這點來看，有必要確定其名稱。這裡用「批判著名文化人」不過是為了方便。敢於用這個方便的叫法，也是因為文化革命確實具有這項特徵。[55]

竹內逐漸察覺到這場運動的荒誕之處。例如他提到連《義勇軍進行曲》（1935）的作詞人田漢（1898-1968）也被批鬥，疑惑著：「當〔田漢〕成為反黨、反社會分子，這歌還能唱到何時？」吳晗（1909-1969）成為文革的箭靶，但他受批判的《朱元璋傳》（1964）明明「在出版前，毛澤東曾經讀過原稿並表達了意見」。因此竹內認定，文革作為一場學習毛

---

[52] 〈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第 1 版。題目由《光明日報》編者所取，為此發言定調。

[53] 竹內實：〈中国文化革命の意味〉，《現代の眼》，第 7 卷第 7 期（1966 年 7 月），頁 129。Takeuchi Minoru,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dai no me*, Vol. 7, No. 7 (Jul., 1966), p. 129.

[54] 竹內實：〈毛思想学習運動の分析〉，《中央公論》，第 81 卷第 8 期（1996 年 8 月），頁 251。Takeuchi Minoru, “Analysis of the Maoist thought study movement,” *Chūō Kōron*, Vol. 81, No. 8 (Aug., 1966), p. 251.

[55] 竹內實：《中国——同時代の知識人》，頁 40。Takeuchi Minoru, *Chin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p. 40.新近的研究顯示，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確實具有針對文化藝術界的「文化革命」，這與往後成為主流且規模巨大、全國性的「文革」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從這點來看，關注文人動向的竹內可謂巧合地洞察到「文革」的核心。見吳一慶：〈何為「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上）〉，《二十一世紀》，第 200 期（2023 年 12 月），頁 53-74。

澤東思想的運動，那些被批判的文化人將認為自己被批判的原因乃「與毛澤東有深厚關係的人」有關。[56]文革在文藝界（京劇界）掀起序幕，即姚文元（1931-2005）批判吳晗京劇《海瑞罷官》（1959）而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一文為開端。竹內以文學論文學，當時不知道郭沫若的歷史劇有何不妥。[57]因而竹內似乎認為郭沫是無辜受牽連，其「詩人的」自我批判應該帶點嗤之以鼻的意思。

此時竹內對文革批評仍以其思維邏輯及文藝為重心：

> 於被批判的一方，學問、藝術與政治之間有著密切關係（或對應關係）；而批判一方，又是如何進行著這種密切關係（對應關係）呢？我們仍不清楚。雖然「把著作燒掉」是一種具詩意的說法，但就像從歷史學、哲學領域看到的那樣，如果強調與傳統思想之間的嚴重斷裂，否定的方法被過於簡單化，那反而無法成為創造的契機。
>
> 假如上演傳統京劇劇目被行政命令禁止，那對現代京劇的發展也未必有正面作用。[58]

這是竹內對（他想像的）郭沫若的弦之外音，即「宣言要寫出更好的作品」的反駁。他已經察覺到「學問、藝術」等知識與「政治」之間脆弱且不平等的關係了，但從中國知識分子的立場來看，他們最擔心的恐怕是死活問題，而竹內擔心的是文藝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之下無法健康發展。

一九六八年夏天，文革在這兩年的破壞力已超出竹內想像，他終於忍無可忍，嚴辭否定文革。他在文學雜誌《群像》刊登長篇文章〈對話毛澤

---

[56] 竹内實：《中国——同時代の知識人》，頁 36-37、47。Takeuchi Minoru, *Chin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pp. 36-37, 47.

[57] 竹内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9。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9.

[58] 竹内實：《中国——同時代の知識人》，頁 50。Takeuchi Minoru, *Chin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p. 50.

東——「牛鬼蛇神」及其他〉，被認為是向毛澤東思想正式訣別的宣言，[59]也是竹內自認為自己關於文革最具代表性的文章。[60] 事實上，這亦是竹內對造成當時文革現狀及遠因分析得最透徹，且感情最強烈的文章，可謂是與毛澤東、文革、所有聲援文革的知識分子劃清界線的有力聲明。[61]它展示的，是一個既深愛中國、尊敬毛澤東，又徹底痛恨文革的學者之複雜心境，以及他作出對毛澤東的告別和控訴。

文章從從一個由眾多比喻構成的場景說起，當中已充滿竹內的怨憤：

> 假設我們街道上的書店、車站的報攤上所有雜誌都消失，學術雜誌不能發行，著名的小說亦成為禁止販賣的「毒草」，而且這情況還持續幾年，那麼我們的精神就會感到極度「飢渴」。當然，這不是在說，一切應讀的書籍都沒有了，想不出應寫的語句。但是，陷於這狀態、處於這狀態兩年（截至一九六八年），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知識生活」被封鎖、受到打擊。毋須多言，我指的是中國的現況。那裡的「知識生活」是一片空白，可以想像，如果能意識到那種空白，那麼恐怕那就不再是空白，而是陰鬱慘澹的日常。
>
> 但是，毫無疑問，現在的中國卻洋溢著與陰鬱慘澹精神的另一極端，即有種明朗、高昂的精神，例如為了批判修正主義或打倒資產階級實權派，不斷精力充沛地發起各種活動。因為要觀賞「反動」電影然後將之批判，所以或許又不能斷言那裡完全沒有「知識生活」。然而，由於這明朗、高昂精神

[59] 馬場公彥：《戰後日本人の中国像》，頁 260-261。Baba Kimihiko, *Postwar Japanese Image of China*, pp. 260-261.

[60]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67。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67.

[61] 竹內寫了這文章後，就惹來認同文革的人的不滿。見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自評〉，《中国研究月報》，第 64 卷第 5 期（2010 年 5 月），頁 40。Takeuchi Minoru, "A Self-review of "On China"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by Takeuchi Minoru,"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64, No. 5 (May, 2010), p. 40.

> 的活動的反面是生活有著陰鬱慘澹的空白，我懷疑，這種明暗的對照本身，是否可以使所謂「批評」的功能正常發揮。[62]

當言論空間完全被抹殺，竹內認為人們按理應會陷入一種陰暗、垂頭喪氣的知識飢渴狀態之中，但文革中國下的人卻是異常興奮、「明朗」、「高昂」地參與批判活動，那是既吊詭，又令人心寒的畫面。接著，他接連列舉了不少被紅衛兵批鬥的知識分子，他們一些已經死亡或被謠傳死亡，亦舉出他預測會自殺的名人，包括作家巴金（1904-2005）、老舍（1899-1966）、冰心（1900-1999）、美術史家傅雷（1908-1966）、藝術家紅線女（1923-2023），竹內讚揚他們是「最誠實、真正面對革命，為革命賦了光榮的人，他們是不寫『革命文學』的革命文學家」。[63]接著話鋒一轉，轉向批評紅衛兵手段的泯滅人性，及譴責其背後勢力的殘暴：

> 由於紅衛兵背後有個不現真身、真正的攻擊者，他們發起的攻擊和遊街就更加殘暴。這是最大屈辱，在眾目睽睽下受到這種屈辱的人，成為了一具無法掙扎的「肉體」。即使他們能夠忍受而不自殺，其人格亦已然喪失。重視「面子」的中國人，甚至是得到大學教授以上的社會地位的人，被逼戴上那可憎的三角帽，像過往對待土匪、馬賊一樣被帶去遊街示眾，這是比死更苛刻的刑罰。[64]

這是竹內對文革最直接的批評。他續說：「有時候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槍殺一個人，不就反而承認對方是一個人嗎？」[65]而紅衛兵背後有

---

[62]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68-69。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68-69.

[63]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72-75。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72-75.

[64]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75-76。*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75-76.

[65]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76。*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76.

「不現真身、真正的攻擊者」的說法，呼應了竹內在一九六五年認為批判事件「有黨中央的指導」的說法。他不敢肯定毛澤東是批判知識分子的始作俑者，但他肯定地說：「從他〔毛澤東〕的革命觀來看，他當然支持紅衛兵的『亂』和『鬧』。」[66] 這是他當時相當罕見的、直接對毛澤東的批評。

善於理解文章修辭的竹內又考究了文革一個常用語「牛鬼蛇神」的起源、演變。竹內忽然探討「牛鬼蛇神」用法演變的理由，恐怕與他意識到文學在政治下功能的改變有關。他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狂熱的政治底下，文學性比喻不止是單純的比喻，修辭搖身一變成為了政治式審判。」[67] 這說法反映了他對一些粗暴用語的敏感，畢竟他一直關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可是，知識分子的境遇惡劣至此，他對知識分子抱有相當大的期望，像是想像郭沫若的「把著作全部燒毀」是違心說話一樣，他認為知識分子為文革的發生有幾種責任：第一，即使人數不少，也無法反抗批判運動、整風運動，使它們擴大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文革；第二，部分人攀附權力，與國家合謀，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們本身也會參與批判運動，使到後來到自己被批判時，再無理論抵抗；第三，他們想名垂青史，成為「開國元老」，所以怎樣都無法否定毛澤東。[68] 竹內對知識分子的批評，不能不說有點苛刻，他期望每個知識分子都是聖人，能夠不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第三個原因更有誅心之嫌。然而，竹內同為知識分子的一員，他過往不亦是對中國隱惡揚善嗎？事實上，他自己亦認同毛澤東是個偉大的英雄。[69] 無論如何，這篇文章是竹內對文革與毛澤東思想的一次最強而有力的否定。但是，撇開它對文革現況、責任誰屬的分析，它同時亦讓人能夠

[66]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85。*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85.

[67]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82。*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82.

[68]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98-99。*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98-99.

[69] 這種想法在竹內所撰的各種毛澤東傳記中就很容易看得出來。詳見後文。

窺探竹內怨憤的內心、對理想幻滅的悲痛。

竹內一直循文學了解中國，但大量文人遭批鬥並落得悲慘下場，成為他直斥文革的最大契機。但於這種義理與感情上的爆發，沒有令他論述中國的文章流於情緒性的悲憤，反更能以更宏觀的角度、更冷靜的目光來俯瞰中國的形勢、了解文革的性質。譬如他談及中國傳統的「忠」與「孝」道德觀時指出，文革下中國社會正從以「孝」為基礎的社會，過渡成以「忠」為基礎的社會，為文革就是將「忠」轉化為普遍道德的大工程之開端。他想像部分中國的傳統道德很可能只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而當時在文革反複強調的、正在政治化的「忠」，是把「忠」上升到普遍的、固定的「傳統思想」之過程，更認為「孝」就是完成了這個過程的產物。這反映了竹內對文革的分析昇華至更高境界。自〈對話毛澤東〉之後，竹內對文革、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分析頗具深思，相當精彩，一洗文革以前文章暗藏的優柔寡斷。[70]

無論竹內如何嚴肅地否定文革，由於他對毛澤東留有同情，這些感情又反過來影響他對文革的觀感。在首次知道北京出現紅衛兵並砸爛老舖的招牌時，他感到一種近乎懷念的熟悉，這與他在山東的兒時經歷有關，讓他在情感上對他們產生某些共鳴。[71] 他在理性上否定文革，在情感上似乎又了解紅衛兵那種近乎瘋狂的凝聚力，這使他對中國情感顯得複雜，不能單純以「肯定」或「否定」來概括言之。竹內在二〇〇九年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自選論文集時，為以前的文章添上「題解」，作為一種回顧或解釋。就在〈對話毛澤東〉的「題解」裡，他就透露了對文革的複雜情感：

> 假如你問我是肯定還是否定文革，或許我會答否定吧。但是，當身處在文革的風暴之中，就很難在中國文明的模式裡堅持將它否定吧。

[70] 竹內實：《毛沢東ノート》，頁 146-167。Takeuchi Minoru, *Notes on Mao Zedong*, pp. 146-167.

[71]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1、68。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1, 68.

> 加上，我亦無法完全否定，在情感上對他們失序與混亂之中的凝聚力產生共鳴。我將〈我心中的紅衛兵〉一文放在這卷〔自選集〕的卷頭，就是這個原因。
>
> 但是，我又感到無條件地讚美文革也不好，因此，與此對照，我在卷末放置了〈文章〔文革〕與日本型思考〉一文。[72]

他在評價文革時思考頗有起伏：整體來說，文革還是該否定的。話雖如此，文革卻有些真切的東西值得肯定。但指出文革這一特別的側面，又覺得「讚美文革」不太好，唯有最後還是再多否定它一次。

內心複雜，是竹內對現代中國的最佳寫照。他的中國觀基本建立在中國文學之上，他對文學的熱愛，衍生出對知識分子的關心，當他們在文革受到足以致命的批鬥、侮辱，觸發了竹內對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強烈反感。但正如前述，竹內對毛澤東本人的感情同樣複雜，他親身見過「毛主席」，與之握手。文革以前，竹內幾乎不直接批評他。這很可能是因為毛澤東本身都是知識分子，竹內本身就理想化知識分子，對他們寄望很大，正如他猜想郭沫若並非真心要把自己的著作燒毀一樣。

文革過後，竹內仍持續關心中國的文藝界，也對遇害文人念念不忘。他參與編輯對文革犧牲文人的追悼文集，沉痛地說：「人死了，事件就成為過去，追悼的想法亦會隨時間而轉淡。但是，也許人們深深埋藏在這裡的呼叫和疑問不會消失。」[73] 竹內分析文革時的論述與格局都十分壯觀，

---

[72] 竹内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68。Takeuchi Minoru。*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68.〈文革與日本型思考〉一文寫於 1974 年，原題〈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人──「戰後」、天皇制〉。竹內在文中指日本人戰後仍留有天皇制信仰的思考方式，即信仰與崇拜權威，而戰後日本人則是從信仰天皇制演變成信仰共產黨，以及文革。竹內認為即使日本人不再信仰文革，還是轉向信仰其他東西。見竹内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248-272。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p. 248-272.

[73] 竹内實：〈ひとびとの墓碑銘──文革犠牲者の追悼と中国文芸界のある状況──〉，收入竹内實、村田茂編：《ひとびとの墓碑銘──文革犠牲者の追悼と中国文芸界のある状

例如從文革的「忠」想到古代中國的「孝」也經歷了類似的政治性運用、從不少日本人支持文革而透視他們背後的天皇制信仰邏輯，等等。但是他還沒有完全掌握到文革背後的所有真相。與那些無辜死去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對這場浩劫還有疑問，即使文革完結三十年，他還耿耿於懷，有些疑問還沒有得到答案：

> 我對文革仍有疑問。其中之一，是毛澤東為甚麼要這樣對待知識分子呢？明明他自己也是知識分子。[74]

肆、毛澤東傳記塑造的毛澤東形象及變化

竹內否定文革，但對毛澤東懷有感情，使得在多次為毛澤東作傳時，除了正面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成就、探索其生涯外，亦或顯或隱地顯示出竹內的情感如何受到毛澤東影響。[75]他曾分別在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二年、一九八九年為毛澤東作傳，[76]三者都或詳或略地追溯了毛澤東從出生至傳記出版年分的事跡，固然因時代、資訊流通與材料多寡之不同，愈後者對毛澤東的生平、思想源流的探討相對宏觀。[77]不同時期的毛澤東傳記流露出他心

況──》（東京：霞山会，1983 年），頁 5。Takeuchi Minoru, “Epitaphs for people: commemora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in Takeuchi Minoru and Murata Shigeru (eds.), *Epitaphs for People: Commemora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Tokyo: Kazankai, 1983), p. 5.

[74] 竹內實：《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頁 282。Takeuchi Minoru,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p. 282.

[75] 竹內實的毛澤東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以傳記透視毛澤東的整體形象。本節雖集中討論其傳記蘊含的情感，事實上各傳記都有不少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洞見。參張放：〈竹內實對毛澤東的研究〉，《毛澤東研究》，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10-115。

[76] 1965 年，竹內實著《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從長沙時代的毛澤東開始寫起，並在敘述相關經歷與歷史事件後，分析其詩詞，突出毛澤東詩人與政治家的雙重身分。然而，書名的「詩詞」與「人生」是並列關係，不是從屬關係。就其體例而言，稱此書為「詩詞集」，而非「傳記」，似乎更為妥當。

[77] 分別為竹内實：〈毛沢東伝〉，收入毛澤東著：《毛沢東語録》，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東京：河出書房，1966 年），頁 223-260。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in Mao Zedo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trans. Wada Takeshi &

境的微妙變化。

三部傳記是作者對毛澤東的態度浮動的寫照。三者的成書時期，日本的社會氣氛及對文革的態度都不盡相同，竹內的傳記亦反映了他在大環境中的思考與批評：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初期勢頭正勁，他承認毛澤東的偉大和魅力，但由於否定文革的立場，他不安地意識到毛澤東埋藏深處的某種孤獨；一九七二年，文革頹勢已定，他似乎更加相信毛澤東確實懷著那種孤獨，但其筆觸卻又像要突出毛澤東的偉大；一九八九年，毛澤東逝去超過五分之一世紀，他寫的傳在行文上較前兩者大幅褪去了感情色彩，帶有冷眼旁觀之感。為同一人物作三次傳記是特別的。其價值不僅在如何評價傳記主角，也在於了解作傳者情感的流動。

一、《毛澤東傳》（1966）：偉大但孤獨的毛澤東

〈毛澤東傳〉是一篇短文，描繪了毛澤東從出生、學習歷程，到加入共產黨，成為最高領袖的經過，並採用了一種頗為人性化的筆觸來刻劃毛澤東的形象。[78]比起塑造領袖、革命家等激情乃至超凡入聖的形象與神話，毛澤東作為一個「人」的性格與經歷更能吸引竹內的目光，所以他花了不少篇幅講他的婚姻、家庭，也想像他的內心世界。同理，竹內只相當簡略地提及馬克思主義，直截了當地言自己對「毛澤東是否馬克思主義者之類的正統派論爭沒有興趣」，斷言「馬克思有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有毛澤東的思想體系」。[79]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態度並不負責任。但毋須苛責竹內，正如可以從他譯介的文學的類型、關心「公社文學」的態度得

Ichikawa Hiroshi (Tokyo: Kawade Shobō, 1966), pp. 223-260.；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八億の民を動かす魅力の源泉》（東京：光文社，1972 年）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The Origin of His Charisma for Eight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okyo: Kōbunsha, 1972).；竹內實：《毛沢東》（東京：岩波書店，1989 年）。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Tokyo: Iwanami Shoten, 1989).

[78] 竹內多引用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的著作，包括《紅星照耀中國》、《今日紅色中國》（*Red China Today*，1962）、《紅色中國雜記》（*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7-1945*，1968），亦曾引用蕭瑜（1894-1976）《毛澤東和我的乞丐生涯》（1959）和親中共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1943）等。

[79]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35。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35.

知，他的關注點落在人的質樸、平凡之天然素質。他視毛澤東為一個立體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個體，並不想學究地視毛澤東為某種主義、思想下的產物。他此刻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竹內說：

> 國際性的思想甚至為渺茫的中國湖南省的一名青年帶來思想的變動。與此同時，中國亦捲入世界史之中。中國進入一個位置，那並非與人類命運無關的存在，而是不得不與其他民族、他人肩負起共通責任的位置。青年毛澤東四處摸索，終於選擇馬克思主義，或者被馬克思主義吸引，這些事情最終通過中國的變革與動向獲得了世界政治的意義。[80]

竹內筆觸下的毛澤東似乎有種身不由己的宿命：辛亥革命、俄國革命等歷史大事，驅使那「渺茫的中國湖南省的一名青年」遇上馬克思主義。究竟毛澤東是主動「選擇馬克思主義」，還是被動地受「馬克思主義吸引」？竹內這種說英雄故事的敘述方法，賦予了毛澤東一種受命運擺佈的形象。從消極層面說，是身不由己，從積極層面說，則是天選之人。竹內繼續想像，毛澤東的思想形成時期，有著更宏大的理想：「從一種思想到下一種思想的時候，他完全沒有那種與舊思想訣別的苦悶。恐怕對毛澤東來說，思想本身不是其終極目標。如果思想就是其終極目標的話，那麼那並非學說上的思想，而必定是統攝自己與中國的革命家們的一切實行過程的思想吧。」[81]竹內想像毛澤東背負著「中國的革命家們」的思想、理想而登場的，因此他認為即使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完全將過去的思想捨去」。[82]竹內想像的這種所謂統攝，既是中國革命思想集大成，但在他文學式的筆法下，亦代表著一種沉重的包袱。

〈毛澤東傳〉的基本論調是：毛澤東在中國國勢既倒之際誕生，伴隨著思想鬥爭、政治鬥爭而成為領袖，是故他一方面偉大，另一方面卻孤獨。竹內察覺到毛澤東受到世界史變動的身不由已，以及身上所背負的東

[80]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41。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41.
[81]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42。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42.
[82]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42。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42.

西之多，所以竹內一方面對激進的「整風運動」有所保留，認為那會「容許家父長式領導、帶來弱化黨內民主主義的傾向」，也可能「流於形式、產生偽善」，但他又另外指出，延安時期的中共已經明明白白的一個「國家」，共產黨員的政治是「以明日的中國為宗旨施行，亦即展示未來的櫥窗、成為未來一部分的實體。站在頂點的，就是黨中央政治局，是毛澤東」。[83]竹內的說法，或許帶有一種「必要之惡」的意味。所以他認為毛澤東雖然偉大，卻又是孤獨的，並引用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的一段作佐證：「我了解到，我最初在毛澤東身上感到的那種不吉祥的性質是他精神上的孤獨。〔……〕少數非常了解他的人都對毛澤東產生好感。但是，毛澤東的精神將自己孤立，被禁錮在自己的內心深處。」[84]

從竹內的角度看，發動文革，或許最能體現毛澤東的孤獨。文革爆發初期，當中國民眾和不少日本人為之叫囂，視毛澤東為堪比神佛的偉大領袖時，竹內忽然筆鋒一轉，提到自己對毛澤東的印象：

> 在我印象中，他是個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模式中將自己發展至極致的人。我認為，想著像他深夜關在放置著中國直線家具的書齋裡，孤獨地瞑想、思索，是最適合他的。確實，他發起革命，在戰爭中戰鬥。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本來就不是跟政治爭論、革命無緣。他經常批判知識分子或許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知識分子，對容易受到的傷害和暗中的對抗很敏感吧。[85]

又想像毛澤東是一頭外表剛強，卻內心受傷的「猛虎」：

> 毛澤東青年時代訓練有素的肉體具有堅實的身體，那比常人稍闊的肩幅，予人一種猛虎的感覺。但是，那裡看得出一種，在某處受了傷，而不輕易地向人展示的自尊心。或許在

[83]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48。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48.
[84]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49。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49.
[85]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60。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60.

> 他的內心深處，史沫特萊說的那種黑暗的虛無主義，正在與中國傳統的虛無主義連結，並隱藏起來。[86]

當時的竹內隱約地感覺到文革將會悲劇收場，這場運動恐怕要摧毀毛澤東，並預言激進的文革，對毛澤東來說甚至可能是一種「回歸於『天』的準備」。[87]竹內賞析毛澤東詩詞的著作《毛澤東：其詩與人生》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同樣在此「英雄孤獨」的基調與氛圍下理解毛澤東，他借用當時已故中國文學者岡崎俊夫（1909-1959）的評論總評毛澤東的詩詞：「那裡有一種寂寞的迴響，有個孤獨的影子。那不限於詞，而是中國的傳統詩人的靈魂。正是窺探孤獨的深淵，才誕生出真正的所講人民愛。」[88]「回歸於天」、「寂寞的迴響」、「孤獨的影子」這些富感情的用詞，當然並非冷漠的宿命論，而是一種對孤獨英雄的憐憫和認同。

二、《毛澤東的生涯》（1972）：平凡但偉大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生涯》副題為「推動八億人民的魅力的源泉」（八億の民を動かす魅力の源泉），[89]與〈毛澤東傳〉相似，此書不對毛澤東思想作哲學性的分析與討論，仍是聚焦在人物傳記上。撇除序章與終章，此書按時間順序以五章探討、追溯毛澤東的生涯，同樣從毛澤東的出生談起，到成長、求學的思想激蕩，遇上馬克思主義、加入革命，經歷各種內鬥外鬥，終成為中共領袖，描繪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的舵手」的心路歷程。

副題中的「魅力」是值得玩味的詞語，它代表了竹內對毛澤東的印象。毛澤東的生平事跡於竹內來說，不僅是一個政治領袖的誕生、成長與

---

[86]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60。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60.

[87] 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60。Takeuchi Minoru,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60.

[88] 武田泰淳、竹內實：《毛沢東：その詩と人生》（東京：文藝春秋新社，1965 年），頁 18。Takeda Taijun & 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His Poetry and Life* (Tokyo: Bungei Shunjū Shinsha, 1965), p. 18.

[89] 中國譯本將此傳副題譯為「調動八億人民的魅力的源泉」。日語「動かす」除了有物理地「調動」之意，亦有「感動」的意思。筆者認為竹內刻畫的毛澤東兼具兩種意思，逕自譯為「推動」。中譯見竹內實：《竹內實文集（第四卷）：毛澤東傳記三種》，韓鳳琴、張會才（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

走入權力核心的人物傳記，更是一個充滿熱情與寂寞的浪漫英雄故事，其故事令人敬佩、尊敬，當然還有感動與同情。但竹內並沒有憑空想像，將之浪漫化、神話化。事實上，他筆下的毛澤東故事的基調還是在於毛澤東是個有血有淚、有七情六慾的平凡人，縱有非比尋常的功績，但與之如影隨形的還有無盡孤獨與苦惱。他不是第一次用「魅力」來形容毛澤東。例如，他感到瑞金時代的毛澤東內心已萌生了「寂寞的東西」，有「某種無法抓緊的東西」使他感受到「不可思議的魅力」。[90]他在傳中不時想像毛澤東內心世界，在他得意時實際上如何孤獨、在危急關頭又怎樣費煞思量、突破困局，這種運籌帷幄的形象正是竹內所指的「魅力」之一。

但是讓他更感受到「魅力」的，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其孤獨。第三章的名稱「獨立寒秋」（独り　寒き秋に立つ）來自毛澤東《沁園春・長沙》（1925）。竹內本來就是中國文學的研究者，認為這首詞是傑作，它讓人聯想到「只有一個人與中國的歷史和大地對峙而站立的毛澤東」。[91]他在想像，孤身一人的毛澤東正在面對和承受整個中國的時間（歷史）和空間（大地）兩種維度，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同時又是孤獨的。其想像既帶浪漫色彩，同時暗含悲哀：

> 這首毛澤東的詩集所收的第一首詞的首句，就是「獨立寒秋」。這句不就成為了他的「詩讖」嗎？此處的「獨」，就讓人想到他最終要與最愛的妻子離別、失去妻子的命運。
>
> 不，這句畢竟只是一個以自身雙腿立足之人的自畫像。面對即將來臨的冬天，他也許不會低頭吧。[92]

毫無疑問，竹內灌注了相當大的個人感情去想像毛澤東的孤獨。他解讀文學，也相當感性地視「寒」、「秋」、「冬天」作毛澤東的孤獨、盛

[90] 竹內實：〈中国の指導者〉，《現代の眼》，第 4 卷第 4 期（1963 年 4 月），頁 46。Takeuchi Minoru, “The Chinese leaders,” *Gendai no me*, Vol. 4, No. 4 (Apr., 1963), p. 46.
[91]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132。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132.
[92]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132。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132.

年與晚年。撰寫此傳記的一九七二年中期，毛澤東仍然在世，竹內言其面對「冬天」，暗示他將因文革而迎來人生的最後一頁。同時，日本社會對文革、社會主義的評價陷入谷底，連帶對革命領袖毛澤東其人的看法都變得相當負面。這反而使竹內更感悲涼。

對《沁園春・長沙》首句「獨立寒秋」的分析本身，也透露了竹內心境之變化。一九六五年分析這首詞時，他並沒有多花筆墨刻劃「獨立寒秋」這句，而是想像毛澤東望盡眼前廣闊的湘江與天地，想像「我〔毛澤東〕向大地發問，此前歷度王朝興亡，現在又有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勢力、買辦財閥，人民在此之下被壓逼著，究竟主宰歷史勝敗之人是誰？」當時他想像的，是意氣風發、具有英雄氣慨的毛澤東。[93]而現在，文革頹勢明顯，竹內又在此詞中有新的發現。

他的心情自然與寫〈毛澤東傳〉時形成巧妙的對比：當文革爆發，中、日社會為之振臂歡呼。竹內承認其偉大，但並不隨波逐流。在這種瘋狂與熾熱的氣氛下，他看出了某種英雄內心的孤獨與悲劇性。在寫《毛澤東的生涯》時，質疑文革的聲音漸大，日本人開始質疑左翼革命，連同毛澤東熱潮也開始冷卻。與此同時，竹內對功業未竟的毛澤東產生了更多的同情，那不僅只是預測文革將要迎來失敗的同情，而是那種對英雄被眾人拋棄的孤獨的憫憐之情。書名敢於用一個表面看起上來是褒揚毛澤東的副題——推動八億人民的魅力源泉，也可說是竹內對毛澤東的惻隱之心。

竹內對毛澤東的同情，導致了他不能完全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竹內談文革的篇幅不多，主要提到毛澤東動員紅衛兵，以及批判劉少奇令其失勢之事。竹內並沒有直接加以臧否，而是筆鋒一轉，平淡地說：「即使經過這些大變動，且這些事也是他親手造成的，但他的個人生活沒有甚麼大變化。如果脫離他外面的政治生活，把他只作為一個人來看，他不過是個簡單、勤勉的知識分子。」[94]在書中「孤獨的革命家」一節最後，竹內援引一

[93] 武田泰淳、竹內實：《毛沢東：その詩と人生》，頁 49-57。Takeda Taijun & 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His Poetry and Life*, pp. 49-57.

[94]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34。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34.

九六五年八月法國文化相安德烈・馬爾羅（Georges André Malraux，1901-1976）與毛澤東會面時，毛澤東的自白：「我孤單一人率領群眾。」[95]又誤用了毛澤東對斯諾說自己「和尚打傘」的誤譯：「我不是個複雜的人，而是個簡單的人，我不過是個隻手拿著破傘前行的孤獨修行僧而已。」[96]這些人的「證言」加深了竹內對毛澤東孤獨無私的想像：

> 為了革命，不僅是自己的整個人生，他也奉獻了最愛的家人、兄弟。然而，他沒有從革命得到任何東西。[97]

竹內從不將毛澤東神格化，而是在毛澤東身上看出人的七情六慾，特別是其孤獨、平凡的一面，可謂「英雄見慣亦常人」：「他是個教師，但並非將自己化為非凡的存在，要人向自己學習的那類教師。他也不是那種用艱深的用語、說難懂的事情的教師。他是個用平凡的語言，教別人做個平凡人的教師。」[98]竹內最後提到關於林彪落馬的事，他沒有預測林彪事件之後中國和文革的發展，只認為無論如何，毛澤東將作為「作為一個平凡但偉大的教師」，留在中國民眾心中。[99]著此傳的同一年，竹內也出版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一書，分析毛澤東與中共作為中國歷史上循環不斷的「率領者」與「被率領集團」之間相生相剋的關係，且概嘆「作為革命黨的中國共產黨位處在中國歷史的無限反復〔指領袖與中央政權互相產生、依附，又同時互相衝突、矛盾的關係〕之間，是悲劇的」。[100]對「獨立寒秋」的鑽研，又將毛澤東定位為中國歷史機制上的一個「悲劇」，反映了正當日本社會正在離棄、否定毛澤東時，竹內則表達了關心與感嘆。

---

[95] 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錢培鑫、沈國華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頁 435。竹內只引用了「我孤單一人」這部分。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40。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40.

[96]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40。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40.

[97]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40。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40.

[98]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46。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46.

[99]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247。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 247.

[100] 竹內實：《毛沢東と中国共産党》（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 年），頁 6-7。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kyo: Chūōkōronsha, 1972), pp. 6-7.

三、《毛澤東》（1989）

一九八九年，竹內出版自己最後一本毛澤東傳記《毛澤東》，文革已過去多年，他的心境已然變得冷靜，甚至是冷淡。一九九一年，《毛澤東》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他在中文版序直言：「中華世界裡複雜得很，也可以說含蓄得很，深奧幽遠，很難捉摸，它變幻起來，很難追踪，甚至可以說狡猾得很好。但，它是很認真、莊嚴、甜蜜地等待有心人的追踪，無論是從大的角度，或者是從細膩精微的角度。出生在湖南省一戶勤勉的農家裡的一個嬰兒〔毛澤東〕，隨著他的成長，他發現，他認為自己應該加深認識和徹底解決的，就是這個複雜的問題，即中華世界必須解決的問題。」[101] 這次，他不是要解釋毛澤東為何具有魅力，而是要「追踪」毛澤東的一生。

「追踪」一詞相當平淡，不再像上一本傳記明示要解釋毛澤東的「魅力」，這次從標題無法看出竹內寫此書的心境。但是，只要對照三種傳記對某些相同事物的表達方法，我們還是能看出不同時期竹內對毛澤東的不同心情。以描述毛澤東父親毛順生（1870-1920）對兒子的影響為例：

〈毛澤東傳〉寫道：

> 儘管他憎恨著父親，但父親足以令家人都反抗的嚴格、儉約、勤勉、行動力、專心致志的上進心、對認為是空想空論的東西的冷淡，連同從母親繼承而來的寬大、對窮人的同情心，毛澤東都頗得遺傳。[102]

《毛澤東的生涯》則說：

> 他從父親繼承的東西亦很多。足以令家人反抗的嚴格、非從

[101] 竹內實：《毛澤東》，黃英哲、楊宏民（譯）（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頁 II。

[102] 同時，竹內對將毛澤東向父親反抗與他將來的革命活動拉上關係之想法也有保留。竹內實：〈毛沢東伝〉，頁 228。Takeuchi Minoru, ,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p. 228.

> 宗教式禁慾而來的儉約、貫徹全體人生的勤勉、行動力、專心致志的上進心、對認為是空想空論的東西、收集嗜好或美術品的冷淡，以及那又高大壯健的體格，形成了毛澤東性格的核心。
>
> 尤其是父親工作的樣子展示了模範，透過叱責與毆打烙印在肉體勞動的習慣，亦向毛澤東植入了一個無條件的信念。那信念是：人應該要肉體勞動，肉體只要勞動就一定會有收穫，肉體勞動絕不會背叛人。這才是他所反抗的父親，留給他的最大遺產。[103]

在《毛澤東》則成為：

> 〔毛順生〕體格強壯而且很高（毛澤東也很高）。〔……〕
>
> 石三〔毛澤東的乳名〕很聰明，四歲的時候，已經很懂得與大人講道理。到了六歲，父親讓他到田裡工作。毛澤東不歇息的勤勉、做事熱心的樣子，可能就是在此時被父親調教而來。[104]

〈毛澤東傳〉與《毛澤東的生涯》要突出毛澤東的故事色彩，特別在《毛澤東的生涯》，為了強調毛澤東的「魅力」所在，〈毛澤東傳〉的描寫顯然是不足夠的，於是在這基礎上加筆，要在「儉約」前加上「非從宗教式禁慾」的，以證明其個人意志的強韌，又在「勤勉」補充那是「貫徹全體人生」的性格云云。當時，日本人續漸不視中國為日本未來的想像。竹內晚年編文革自選集時的糾結，其實在此時期已出現，即當大眾否定文革、毛澤東時，他又感受到毛澤東的而且確有種不容忽視的「魅力」所在。相較之下，《毛澤東》對此的描述可謂相當收斂，與其簡單地說它平

[103] 竹內實：《毛沢東の生涯》，頁 39-40。Takeuchi Minoru, *The Life of Mao Zedong*, pp. 39-40.

[104] 竹內實：《毛沢東》，頁 15-16。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pp. 15-16.

淡，或許說作者已經對這種浪漫式的描繪失去興趣，毛澤東於他眼中再沒有神秘的、英雄的色彩。言毛澤東「聰明」、「勤勉」、「做事熱心」，實乃公正評論，但也僅此而已。

對於之前常常深入毛澤東內心世界的傳記與文章，《毛澤東》同樣作為傳記，卻意外地直接，相當「線性」。如在文革初期，竹內認為文革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但現在他改變了觀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打倒劉少奇，這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即使那不是唯一目的，如果沒有將他打倒，毛澤東亦會窮追猛打，直到打倒他為止，不會手軟。」而毛澤東痛恨知識分子的事實，當然要被竹內提出來，對他挖苦一番。[105]

竹內還是不免要觸及毛澤東的性格，作為其一生的總結。總括來說，他認為毛澤東的一生是個「同心圓的擴大」：

> 回望毛澤東的一生，他沒有往左或右動搖過。雖然在政策上看到急劇轉變，如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舉反轉成反右鬥爭等等，但這於他並不意味著轉向。他的一生就像用圓規畫出一個又一個很大的圓形，其立足點完全沒有移動。儘管它看起來像往左移動過，但不過是這個同心圓的擴大。
>
> 新的圓形比之前的圓形更大，但中心一點沒有改變。那一點，以他的話來說就是「本源」，而他將「階級鬥爭」嵌入這個中心。
>
> 圓規腳逐漸擴大，從長沙市內的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遊擊戰、土地改革、建設蘇區、整風運動、建設新國家、與蘇聯論戰、訣別，到文化大革命，不斷擴大，但立足點的針尖卻屹立不動。
>
> 〔……〕

[105] 竹內實：《毛沢東》，頁 151-152，172。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pp. 151-152, 172.

> 他那不動不變的本源，造就在實踐的世界中無限擴大，而支撐這擴大的生成的，是他厭惡休息的性格。他每寫一篇文章，在完成之前都不會睡覺，直到寫完為止。那產生了一種興奮狀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吧。[106]

這觀點於竹內對毛澤東的觀感的變化裏，含有特殊意義。竹內看到那「同心圓」「看起來像往左移動過」，或許原因在於觀察者身上：他從來都不是定點觀察毛澤東，他相當敬重毛澤東，往後攙雜了一些同情、憂慮，文革期間及之後則多了一些厭惡和不屑。那麼，到最後，那個「同心圓」實際上根本「完全沒有移動」過，抑或只是「看起來」沒有移動過？竹內的答案雖是前者，但從他不同時期對毛澤東有不同理解的經驗看來，也不能否定後者的可能性。

他敘述毛澤東的經歷、評價其功過時，其風格再不像從前般以帶著浪漫情調。但是，關於毛澤東與革命的關係，他又說：「革命伴隨著殘酷的現實。毛澤東一直凝視著它，也直接面對更殘酷的局面。那裡沒有半點浪漫主義。但是，卻可說那裡有超越感傷的浪漫主義。」但他沒有說明「超越感傷的浪漫主義」是甚麼，只是引用毛澤東的詞〈憶秦娥・婁山關〉（1935），但也沒有怎麼解釋它如何浪漫。「浪漫」、「孤獨」、「偉大」這三個形容詞隱約隱現地將三部傳記串連在一起，它們構成了竹內眼中的毛澤東形象，只是它們在不同時期，比例各有不同。《毛澤東》並不是竹內毛澤東傳記之集大成，它是一條不斷起伏不定的線上其中一個點而已。

伍、結語

從戰後至文革，竹內對中國的關心從不中斷，但隨著中國局勢發展、意識形態愈趨尖銳時，他的心境亦愈來愈壓抑、不安，為知識分子感到擔

106 竹內實：《毛沢東》，頁 194-195。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pp. 194-195.

憂，最後在文革終於爆發，事過境遷後，當他再為毛澤東作傳時，比從前冷靜得多。但是，那並非對毛澤東蓋棺定論。一九八六年，竹內參加了「歷史中的毛澤東」研討會，發言時馬上進入正題，從結論說起，說若「問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我想我一定答肯定的」。他認為毛澤東是「現代的秦始皇」，如果要從中國歷史中挑選三個代表人物出來，那將會是秦始皇、孔子、毛澤東。[107]如何既「肯定」毛澤東又認為他是秦始皇？竹內以日本的天皇制解釋秦始皇的歷史意義，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有以周皇室為中心的天皇制的」，而打破這「天皇制」的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開創了往後一個自由的、「大家想做甚麼就做甚麼的歷史舞臺」，創造了一個具「民主性」、「政治性」的世界。[108]一般人只理解秦始皇為「暴君」，但竹內認為這標籤實在看不到秦始皇在歷史上的真正姿態。

竹內認為毛澤東是「現代的秦始皇」，因為他同樣打倒的不僅是「天皇制」，還終止了自秦始皇後以來的戰亂：

> 毛澤東為中國近代的、秦始皇遺留下來的全國性混亂狀態，即軍閥內亂畫下終止符。〔……〕
>
> 透過中蘇論戰，他從共產國際的權威獨立起來。我認為透過中蘇論戰中那麼激烈的對抗，他改變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生態。雖然之前有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但也是因毛澤東與蘇聯論戰，才能夠證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並不是過往想的鐵板一塊。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功績。如果視擊潰周王室的是秦始皇的話，那麼毛澤東就是將共產國際擊潰了。（〔竹內〕補充：將共產主義

[107] 竹內實：〈歷史の中の毛沢東〉，收入竹内実、スチュアート•R•シュラム、吉田富夫等：《〔シンポジウム〕歷史の中の毛沢東──その遺産と再生》（東京：蒼蒼社，1986 年），頁 22、26-28。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in history,” in Takeuchi Minoru, Schram Stuart R. & Yoshida Tomio et al., *Symposium: Mao Zedong in History: His Legacy and Rebirth* (Tokyo: Sōsōsha, 1986), pp. 22, 26-28.

[108] 竹內實：〈歷史の中の毛沢東〉，頁 27。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in history,” p. 27.

運動的天皇制擊潰了。）[109]

因此，儘管在研討會上竹內重申自己否定文革，但他還是肯定毛澤東的功績。他以秦始皇類比之，是因為兩者都終結了「天皇制」。正如前述，竹內對日本人盲目信奉權威（天皇信仰）沒有好感，無論秦始皇的治世還是毛澤東的文革如何惡劣，於打倒「天皇制」、開創新局面一點來說，竹內是給予相當高評價的，更何況毛澤東比秦始皇多了一項功績，即帶來「穩定的局面」。

竹內對中國有深厚的鄉土情，對中國文學、文人具有同情，對毛澤東有崇敬之情。他多次為毛澤東作傳，並曾對他的中國友人說：「寫毛澤東傳，一定要愛傳主。」[110]這種「愛」不能理解為毫無條件的愛，由於他一直否定文革，從來不變，所以他能時而冷眼旁觀毛澤東負面的部分，卻又能理性地讚賞毛澤東正面的部分，這種風範是六、七十年代日本一眾盲目、狂熱地吹噓毛澤東的親中左派學者不能相提並論。他能夠坦白地說：「如果問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我想我一定答肯定的。」這種種豁然開朗的自信，既來自其紮實的學問，也來自他對中國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人的關懷。竹內在論文學、文革與毛澤東時，當中的感情與理性是表裡一體的。它反映了毛澤東、文革成為一種符號，不僅在政治、社會運動上產生影響力，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受其波動，可謂「靈魂深處鬧革命」的一種變奏。竹內從文學為出發點，了解及關心中國，他或許對知識分子有些過高的盼望，尤其是文革以前，較少批判性的關懷。

日本人在想像、美化想像英雄人物時，並非在於其無人能及之功業，而往往傾重在該人物的悲壯。[111]竹內之想像毛澤東，同樣有這樣的傾向：雖是帶領中國革命的最重要領袖，其內心卻有陰暗面與不被人理解的孤獨，而文革則是一場自毀。這樣的思考邏輯使得文革不成為竹內完全否定

[109] 竹內實：〈歷史の中の毛沢東〉，頁 28。Takeuchi Minoru, “Mao Zedong in history,” p. 28.
[110] 張惠才：〈竹內實與他的《詩人毛澤東》〉，《中共黨史研究》，第 10 期（2013 年 10 月），頁 115。
[111] Iva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Fukuoka: Kurodahan Press, 2013).

毛澤東的契機，反而成為更能印證毛澤東是英雄孤獨之證據。但構成竹內中國觀與毛澤東觀的最重要因素，應歸因於他對中國的感情。這種感情可說得上是一個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112] 他對文革的批判，以及其情感與理性的抗衡，使他對中國的整體評價超越了純粹肯定或否定的，或左派與右派的二元框架，顯示了日本戰後至文革時期，知識分子在理解中國時一條特別途徑。

[112] 「感時憂國」由文學研究者夏志清提出，本用於指出中國現代文學中具儒家道統中的憂國精神。竹內實持續關注中國文學，也由此關注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故於此刻意借用此概念為竹內之精神作一概括。參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59-477。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丁玲 DING, Ling

1999 〈我在霞村的時候〉，收入丁玲著，陳明編：《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延安作品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 212-229。

"Wo zai xia cun de shihou" (When I Was in Xia Village), in Ding, Ling, *Wo zai xia cun de shihou: Dingling yan'an zuopin ji (When I Was in Xia Village: Ding Ling's Yan'an Works Collection)*, ed. Chen, Ming (Xi'an: Shaanxi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9), pp. 212-229.

毛澤東 MAO, Zedong

2013 〈矛盾論〉，張迪杰編：《毛澤東全集（卷 11）》（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年），頁 27-67。

"Maodun lun" (On contradiction), in *Mao Zedong Quanji Juan 11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11)*, ed. Zhang, Dijie (Hong Kong: Rundong Chuban She, 2013), pp. 27-67.

王宏志 WONG, Lawrence Wang-chi

2016 〈筆權和政權〉，收入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萬芷均、陳琦、裴凡慧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vii-xxiv。

"Biquan he zhengquan" (Power of the pen and the regime), in Hsia, Tsi-an, *Hei'an de zhamen: Zhongguo zuoyi wenxue yundong yanjiu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ed. Wong, Lawrence Wang-chi Wang, trans. Wan, Zhijun, Chen, Qi & Pei, Fanhui et al.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vii-xxiv.

王德威 WANG, David Der-wei

1998 《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Xiangxiang Zhongguo de fangfa: Lishi, xiaoshuo, xushi (Ways to Imagine China: History, Fiction, and Narrativ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安德烈•馬爾羅 MALRAUX, Georges André

2000 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錢培鑫、沈國華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年）。

Fan huiyilu (Anti-Memoirs), trans. Qian, Peixin & Shen, Guohua et al.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竹內實 TAKEUCHI, Minoru

1956 〈魯迅とその弟子たち〉，《新日本文学》，第 11 卷第 10 期（1956 年 10 月），頁 129-131。

"Rojin to sono deshi tachi" (Lu Xun and his disciple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1, No. 10 (Oct., 1956), pp. 129-131.

1957 〈丁玲批判の一結末〉，《アジア経済旬報》，第 344 期（1957 年 12 月）頁 4-9。

"Teirei hihan no ichi ketsumatsu" (One conclusion of criticism of Ding Ling), *Ajia Keizai Junpō*, No. 344 (Dec., 1957), pp. 4-9.

1959a 〈人民公社と文学の問題〉，《新日本文学》，第 14 卷第 3 期（1959 年 3 月），頁 89-101。

"Jinminkōsha to bungaku no mondai" (Problem of people's communes and literature),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4, No. 3 (Mar., 1959), pp. 89-101.

1959b 〈丁玲評価の変遷〉，《文學界》，第 13 卷第 8 期（1959 年 7 月），頁 174-176。

"Teirei hyōka no hensen" (Changes in Ding Ling's reputation), *Bungakukai*, Vol. 13, No. 8 (Jul., 1959), pp. 174-176.

1960a 〈毛主席に聞く『安保闘争』の評価〉，《朝日ジャーナル》，第 2 卷第 30 期（1960 年 7 月），頁 75-77。

"Mō shuseki ni kiku 'anpo tōsō' no hyōka" (Chairman Mao's assessment of the "Security Treaty Struggle"), *Asahi Journal*, Vol. 2, No. 30 (Jul., 1960), pp. 75-77.

1960b 〈新しいものと古いもの〉，收入野間宏等：《写真•中国の顔：文学者の見た新しい国》（東京：社会思想研究会出版部，1960 年），頁 91-118。

"Atarashii mono to furui mono" (The new and the old), in *Shashin, Chūgoku no kao: Bungakusha no mita atarashii kuni (Photographs, the Faces of China: Literary Scholars' View of the New Country)*, Noma, Hiroshi et al. (Tokyo: Shakai Shisō Kenkyūkai Shuppanbu, 1960), pp. 91-118.

1961 〈戦争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新日本文学》，第 16 卷第 11 期（1961 年 11 月），頁 129-137。

"Sensō bungaku to hyūmanizumu" (War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6, No. 11 (Nov., 1961), pp. 129-137.

1963 〈中国の指導者〉，《現代の眼》，第 4 卷第 4 期（1963 年 4 月），頁 45-51。

"Chūgoku no shidōsha" (The Chinese leaders), *Gendai no me*, Vol. 4, No. 4 (Apr., 1963), pp. 45-51.

1965a 〈中国核実験と日本知識人〉，《新日本文学》，第 20 卷第 1

期（1965 年 1 月），頁 124-134。
“Chūgoku kaku jikken to Nihon chishikijin” (China’s nuclear tests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0, No. 1 (Jan., 1965), pp. 124-134.
1965b 〈なにが中国で起こっているのか──中国文化界の最近の動向をめぐって〉，《新日本文学》，第 20 巻第 5 期（1965 年 5 月），頁 82-90。
“Nani ga Chūgoku de okotte iru no ka: Chūgoku bunka kai no saikin no dōkō wo megutte”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Recent trend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s),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0, No. 5 (May, 1965), pp. 82-90.
1966a 〈中国文化革命の意味〉，《現代の眼》，第 7 巻第 7 期（1966 年 7 月），頁 126-129。
“Chūgoku bunka kakumei no imi”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dai no me*, Vol. 7, No. 7 (Jul., 1966), pp. 126-129.
1966b 〈郭沫若の歴史劇について〉，《新日本文学》，第 21 巻第 7 期（1966 年 7 月），頁 137-144。
“Kaku Matsujaku no rekishigeki ni tsuite” (About Guo Moruo’s historical drama), *New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21, No. 7 (Jul., 1966), pp. 137-144.
1966c 〈毛思想学習運動の分析〉，《中央公論》，第 81 巻第 8 期（1996 年 8 月），頁 251-268。
“Mō shisō gakushū undō no bunseki” (Analysis of the Maoist thought study movement), *Chūō Kōron*, Vol. 81, No. 8 (Aug., 1966), pp. 251-268.
1966d 〈毛沢東伝〉，收於毛澤東：《毛沢東語録》，和田武司、市川宏（譯）（東京：河出書房，1966 年），頁 223-260。
“Mōtakutō den” (A biography of Mao Zedong), in Mao, Zedong, *Mōtakutō goroku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trans. Wada, Takeshi and Ichikawa, Hiroshi (Tokyo: Kawade Shobō, 1966), pp. 223-260.
1967 《中国──同時代の知識人》（東京：合同出版，1967 年）。
Chūgoku: dō jidai no chishikijin (China: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Tokyo: Gōdō Shuppan, 1967).
1971a 〈あとがき〉，收入毛澤東：《毛沢東語録》，竹内實（譯）（東京：角川書店，1971 年），頁 392-397。
“Atogaku” (Afterword), in Mao, Zedong, *Mōtakutō goroku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trans. Takeuchi, Minoru (Tokyo: Kadokawa Shoten, 1971), pp. 392-397.
1971b 《毛沢東ノート》（東京：新泉社，1971 年）。

Mōtakutō nōto (Notes on Mao Zedong) (Tokyo: Shinsensha, 1971).

1972a 《毛沢東と中国共産党》（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 年）。
Mōtakutō to Chūgoku kyōsantō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kyo: Chūōkōronsha, 1972).

1972b 《毛沢東の生涯：八億の民を動かす魅力の源泉》（東京：光文社，1972 年）。
Mōtakutō no shōgai: hachi oku no tami wo ugokasu miryoku no gensen (The Life of Mao Zedong: The Origin of His Charisma for Eight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okyo: Kōbunsha, 1972).

1983 〈ひとびとの墓碑銘──文革犠牲者の追悼と中国文芸界のある状況──〉，收入竹內實、村田茂編：《ひとびとの墓碑銘──文革犠牲者の追悼と中国文芸界のある状況──》（東京：霞山会，1983 年），頁 3-20。
“Hito bito no bohimei: bunkaku giseisha no tsuitō to Chūgoku bungeikai no aru jōkyō” (Epitaphs for people: commemora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in *Hito bito no bohimei: bunkaku giseisha no tsuitō to Chūgoku bungeikai no aru jōkyō (Epitaphs for People: Commemoration of the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eds. Takeuchi, Minoru and Murata, Shigeru (Tokyo: Kazankai, 1983), pp. 3-20.

1986 〈歴史の中の毛沢東〉，收入竹內實、スチュアート•R•シュラム、吉田富夫等：《〔シンポジウム〕歴史の中の毛沢東──その遺産と再生》（東京：蒼蒼社，1986 年），頁 22-29。
“Rekishi no naka no Mōtakutō” (Mao Zedong in history), in Takeuchi, Minoru, Schram, Stuart R., Yoshida, Tomio et al., *Shinpojiumu: ekishi no naka no Mōtakutō: sono isan to saisei (Symposium: Mao Zedong in History: His Legacy and Rebirth)* (Tokyo: Sōsōsha, 1986), pp. 22-29.

1989 《毛沢東》（東京：岩波書店，1989 年）。
Mōtakutō (Mao Zedong) (Tokyo: Iwanami Shoten, 1989).

1991 《毛澤東》，黃英哲、楊宏民（譯）（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 年）。
Mao Zedong, trans. Huang, Yingzhe and Yang, Hongmin (Taipei: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Cultural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91.

2002 《竹內實文集（第四卷）：毛澤東傳記三種》，韓鳳琴、張會才（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年）。
Zhu Nei Shi wenji (di si juan): Mao Zedong zhuanji sanzho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akeuchi Minoru [Vol. 4]: Three Biographies of Mao Zedong), trans. Han, Fengqin and Zhang, Huicai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009 《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一）：文化大革命》（東京：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2009 年）。
*Takeuchi Minoru "Chūgoku ron" jisen shū (1): Bunka daikakume*i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On China" by Takeuchi Minoru [1]: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kyo: Asia-Eurasia Research Institute, J.F. Oberlin University, 2009).

2010 〈『竹内実〔中国論〕自選集』自評〉，《中国研究月報》，第 64 卷第 5 期（2010 年 5 月），頁 39-41。
'Takeuchi Minoru Chūgoku ron jisen shū' jihyō (A Self-review of "On China" Self-Selected Collections by Takeuchi Minoru),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64, No. 5 (May, 2010), pp. 39-41.

艾恒武、林青山 AI, Hengwu & LIN, Qingshan

1964 〈「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學習毛主席唯物辯證法思想的體會〉，《光明日報》，1964 年 5 月 29 日，第 4 版。
"'Yi fen wei er' yu 'he er er yi': xuexi Mao zhuxi weiwu bianzhengfa sixiang de tihui" ("One divides into two" and "two combine into one":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chairman Mao's thought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Guangming Daily*, 29 May 1964, p. 4.

光明日報 *Guangming Daily*

1966 〈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光明日報》，1966 年 4 月 28 日，第 1 版。 "Xiang gongnong bing qunzhong xuexi, wei gongnong bing qunzhong fuwu" (Learn from and serve the masses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 *Guangming Daily*, 28 April 1966, p. 1.

吳一慶 WU, Yiching

2023 〈何為「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上）〉，《二十一世紀》，第 200 期（2023 年 12 月），頁 53-74。
"He wei 'wenhua geming'? Wenhua dageming fasheng xue zai tan (shang)" (What I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Origins and Com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Part I]), *Twenty-First Century*, No. 200 (Dec., 2023), pp. 53-74.

吳源植 WU, Yuanzhi

1962 《金色の山々》，竹内實、伊藤克（譯）（東京：至誠堂），1962 年。
Kin'iro no yamayama (Golden Mountains), trans. Takeuchi, Minoru and Itō, Katsu (Tokyo: Shiseidō, 1962).

吳運鐸 WU, Yunduo

1955 《すべてを黨に》，竹内實（譯）（東京：青木書店），1955 年。

Subete wo tō ni (Give All to the Party) trans. Takeuchi, Minoru (Tokyo: Aoki Shoten, 1955).

武田泰淳、竹內實 TAKEDA, Taijun & TAKEUCHI, Minoru

1965 《毛沢東：その詩と人生》（東京：文藝春秋新社，1965年）。

Mōtakutō: Sono uta to jinsei (Mao Zedong: His Poetry and Life) (Tokyo: Bungei Shunjū Shinsha, 1965).

紀穎穎 JI,Yingying

2013 〈竹內實毛澤東研究的貢獻、價值及啓示〉，《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第 27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82-92。

"Zhu Nei Shi Mao Zedong yanjiu de gongxian, jiazhi ji qishi" (The contribution, value and implication of Takeuchi Minoru's Mao Zedong research),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Vol. 27, No. 1 (Jan., 2013), pp. 82-92.

夏志清 HSIA, Chih-tsing

2001 《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 shi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rans. Lau, Shiu-ming Joseph et al,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馬場公彥 BABA, Kimihiko

2010 《戦後日本人の中国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興まで》（東京：新曜社，2010 年）。

Sengo nihonjin no Chūgoku zō: Nihon haisen kara bunka daikakumei, Nitchū fukkō made (Postwar Japanese Image of China: From Japan's Defeat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and China) (Tokyo: Shinyōsha, 2010).

張放 ZHANG, Fang

2020 〈竹內實對毛澤東的研究〉，《毛澤東研究》，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09-117。

"Zhu Nei Shi dui Mao Zedong de yanjiu" (Takeuchi Minoru's research on Mao Zedong), *Mao Zedong Yanjiu*, No. 1 (Jan., 2020), pp. 109-117.

張惠才 ZHANG, Huicai

2013 〈竹內實與他的《詩人毛澤東》〉，《中共黨史研究》，第 10 期（2013 年 10 月），頁 111-115。

"Zhu Nei Shi yu ta de 'Shiren Mao Zedong" (Takeuchi Minoru and his *Poet Mao Zedong*), *CPC History Studies*, No. 10 (Oct., 2013), pp. 111-115.

張灝 CHANG, Hao

2006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You'an yishi yu minzhu chuantong (Sense of Darkness and Democratic Traditio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6).

曹景文 CAO, Jing-wen

2008 〈竹內實和他的毛澤東研究〉，《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40-44。
"Zhu Nei Shi he ta de Mao Zedong yanjiu" (Takeuchi Minoru and his studies on Mao Zedong),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1, No. 6 (Dec., 2008), pp. 40-44.

曹嗣衡 CHO, Chi Hang

2023 〈新島淳良對毛澤東的思想詮釋：「矛盾」非《周易》的「陰陽」〉，《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59 期（2023 年 5 月），頁 87-120。
"Xandao Chunliang dui Mao Zedong de sixiang quanshi: 'Maodun' fei Zhouyi de 'yinyang'" (Niijima Atsuyoshi's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contradiction" is not "yinyang" of the *I Ching*),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CCU*, No. 59 (May, 2023), pp. 87-120.

2024 〈《毛澤東語錄》的民間日語翻譯及其意識形態〉，《編譯論叢》，第 17 卷第 1 期（2024 年 3 月），頁 37-67。
"'Mao Zedong yulu' de minjian riyu fanyi ji qi yishi xingtai" (The Non-Official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Their Ideologie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Vol. 17, No. 1 (Mar., 2024), pp. 37-67.

許仁碩 HSU, Jenshuo

2020 《公安警察と治安判決（1980-2010）：先制的デモ規制体制の確立》（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論文，2020 年）。
"Kōan keisatsu to chian hanketsu (1980-2010): Sensei teki demo kisei taisei no kakuritsu" (Public Security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Judgments [1980-2010]: Establishing a Preemptive Regime for Controlling Demonst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Hokkaido University, 2020).

郭沫若 GUO, Moruo

1962 《武則天：四幕史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2 年）。
Wu Zetian: Si mu shiju (Wu Zetian: A Historical Drama in Four Acts) (Beijing: China Drama Publishing House, 1962).

野間宏 NOMA, Hiroshi

1958 〈國際緊張局勢對作家的活動所起的影響──在塔什干亞非作家會議上的發言摘要〉，《文藝報》，第 21 期（1958 年 11 月），頁 38-40。
"Guoji jinzhang jushi dui zuojia de huodong suo qi de yingxiang: zai tashengan yafei zuojia huiyi shang de fayan zhaiya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ension on writers' Activities: Extracts from a speech at the Tashkent Conference of Asian and African Writers), *Wenyi Bao*, No. 21 (Nov., 1958), pp. 38-40.

富士正晴 FUJI, Masaharu

1957 《游魂》（東京：出版書肆パトリア，1957 年）。

Yūkon (Wandering Soul) (Tokyo: Shuppan Shoshi Patoria, 1957).

菅沼正久 SUGANUMA, Masahisa

2002 〈60 年代、中国研究の奇禍——新島淳良と竹内実のこと——〉，《中国研究月報》，第 56 卷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35-39。

"60 nendai, Chūgokukenkyū no kika: Niijima Atsuyoshi to Takeuchi Minoru no koto" (The Strange Dis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1960s: Niijima Atsuyoshi and Takeuchi Minoru),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56, No. 12 (Dec., 2002), pp. 35-39.

趙長安、王吉文 ZHAO, Chang'an and WANG, Jiwen

2005 《中國的保爾：吳運鐸的故事》（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2005 年）。

Zhongguo de Baoer: Wu Yunduo de gushi (China's Pavel: The Story of Wu Yunduo) (Beijing: Bingqi Gongye Chuban she, 2005).

鄭羽官口述，許謂藩、李鄉瀏記 ZHENG, Yuguan, XU Weifan and LI, Xiangliu

1958 〈奶牛入社了〉，《文藝報》，第 23 期（1958 年 12 月），頁 13-14。

"Nainiu rushe le" (The cows have joined the commune), *Wenyi Bao*, No. 23 (Dec., 1958), pp. 13-14.

龜井勝一郎 KAMEI, Katsuichirō

1962 《中国の旅》（東京：講談社，1962 年）。

Chūgoku no tabi (The Trip in China) (Tokyo: Kōdansha, 1962).

ESSELSTROM, Erik

2019 *That Distant Country Next Door: Popular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Mao's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MORRIS, Ivan

2013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Fukuoka: Kurodahan Press, 2013).